

九
宗教、少数民族

抗日戰爭圖書館藏書
www.krzzjn.com

抗日战争图书馆藏书
www.krzzjn.com

对宗教的渗透

如光其人

高丕琨

笔者于伪满初期在哈尔滨，常随于镜涛到极乐寺找和尚清谈，认识了该寺方丈如光，如光表面上虔诚笃厚，清高稳重，俨然是一个大和尚的风度。他在寺里开堂讲经，也欢迎居士们听讲，他讲经深入浅出，透彻易懂，很受听者赞赏。且极乐寺位于哈尔滨南岗之东端，地势高阔，远离闹市，环境肃静，不躁不烦，院内树木茂盛，清幽雅致，仿佛世外桃源，一临此境，则赏心悦目，留连忘返。自伪满洲国建立后，一些心情沉重，意境空虚的人，更愿到此寻点精神上的寄托和慰藉。有个叫王瑞华的，是旧东北陆军中将，“九·一八”事变时，任东三省特区警察管理处长，因参加伪满的宾州政府失败，寄居极乐寺。穿上袈裟，拿起念珠皈依释迦，诵起阿弥陀佛来。说是为了忏悔愆省，以谢国人，而日本人专找这种曾是有身分且消极颓靡的人，加以利用，哈尔滨日军特务机关平素出钱供养。后来王瑞华竟官至伪锦州市省长。这说明日本侵略者已与极乐寺挂上钩。

如光是辽宁省营口县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生。是半路出家，家中妻子俱全，本是小康，吃穿无虑。只因为人情炎凉无常，世态浇漓乖谬。他藐视趋炎附势，互相倾轧的丑恶世俗，看破了红尘，毅然削发为僧。他是情愿受戒当了和尚，与

一般幼时因病许愿舍到庙上的迥然不同。所以他皈依的信心分外坚决。既洞晓世事人情，又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可以说是在和尚中的佼佼者，连旧东北佛教长老倓虚法师也甚器重他，派他为哈尔滨名刹极乐寺住持。早年他在沈阳，通过佛学会讲经认识了袁金铠，以后又在黄缘佛事中，受到郑孝胥、张景惠等人的重视。

1933年，笔者曾为日本白云和尚在极乐寺讲演作过一次翻译，听讲者有极乐寺的僧众和信教的居士。白云和尚是日本天台宗不结婚的名僧。他讲了五祖宏忍欲求法嗣，令诸僧各出一偈。首先神秀和尚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惠能听了说，美则美矣，了又未了，遂自念一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于是五祖便将衣钵传授给惠能，斯为六祖的佛教故事。同时并阐述了禅宗的哲理和日本一些有关佛教问题，虽然用了一些佛教专用词，笔者尚能一一准确地译出，是以博得讲者和听者的好评。自此而后的一段时期，极乐寺招待客人，如请于镜涛时，笔者亦必在被邀之列。极乐寺的素筵相当丰盛，菜肴种类繁多，故意把素菜做成鸡鸭鱼肉的形状，以飨来宾。笔者在席间曾问如光，为什么偏将素看做动物形状，莫非吃素者还留恋着荤腥的滋味，他却笑而不答。极乐寺没有固定资产，庙上的一切开支，除和尚外出作法事所得的报酬，庙会期间出租给商贩的临时场地费和香火费外，均靠施主的布施和政府微不足道的补助。这是历来住持最为棘手的事，也是如光和尚一大心事。1934年，伪满民政部派如光为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代表团的团长，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国际佛教青年会”，如光被选为该会副会长。正在此时，于镜涛与笔者赴日旅行访问到京都，听说伪满代表团去天台宗大本山比睿山延历寺礼佛。京

都距比睿山不远，我二人遂雇车到延历寺追寻如光，而如光已离去，未得相见。听说伪满派有几名和尚在此留学。如光自任国际佛教青年会副会长后身价倍增。尔后为办事方便，常住在“新京”般若寺。在此期间，由“新京”特别市行政处长肠（是淡虚的皈依弟子）的介绍，认识了“新京”市的总务处长植田贡太郎。植田神通广大，有职有权，笃信佛教，与和尚也谈得来。如光借机为植田老母庆寿，在般若寺特设道场作法事，并设素筵，招待植田全家，极尽奉承阿谀之能事，甚得植田欢心。如光等发起佛教护法会，邀请植田任佛教护法会长。植田任伪满警察总头目（警务司长）后，对佛教更加关怀，在他的大力支持和倡导下，伪满佛教总会很快就成立了。如光任会长，于是如光不仅在伪满，在日本势力领域的宗教界也出了名。

日本人宣传和诬蔑苏联共产党不讲人道，共产共妻，对宗教采取消灭政策，对宗教信徒实行镇压等等。如光亦步亦趋，借口唯黄，说佛教的“末法”在世界上已经露头了，苏联就是一个先例，说苏联已经摧毁了宗教，所有教堂寺庙一概不留，神职人员和宗教信徒一律杀光，还打破家庭制度，不要人伦等等。现在是五浊恶世，濒临危亡，如果不是日本皇军保护，北边红色力量漫透过来，还容许我们设道场讲经说法吗？遭受日本侵略者压榨的中国人中的有钱者听到如光宣讲，好像得到一剂挽救的妙方，相信佛的因果报应，今生虽遭受祸害，如能众善奉行，诸恶莫作，来生还有好转的希望，便忍气吞声不去计较了。

如光不遗余力地宣讲忍辱行善，大慈大悲，日满亲善，相互提携，辱亡齿寒，一德一心，八纮一宇，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打胜大东亚圣战，才能实现王道乐土，过上幸福生活。如光突破了中国和尚从不问国事的旧套，出来苦口婆心，大肆活动，企图唤起满洲国人以佛教兴国。

如光对派日本和尚住进伪满的庙宇事最初尚持有戒心，到后来反而利用这些日本和尚为其办私事。齐齐哈尔市有个叫孔玉书的，搞歪门邪道，用设坛扶乩方法骗取大量金钱，修筑五道院、八卦楼。有个日本宪兵怀疑孔玉书在搞反满抗日的大本营，孔玉书企图贿赂了事，但这个日本宪兵总不放过。孔玉书是如光的皈依弟子，他在危急关头，跑到长春去找师父如光，如光就打发曾在极乐寺住过的和尚关东军特务今井昭庆，去齐齐哈尔进行联络，一场险恶风波就此平息。孔玉书就把自己几十年来骗取财物所经营的八卦建筑群连同周围的十几垧土地全部送给如光，如光接手后，把五教道院牌子换上“大乘寺”。以后如光就在这里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水陆道场，大乘寺的缘起如上所述。据此可知和尚的内幕。如光对一些不满于他或者他不喜欢的和尚，均欲驱逐之，因此和尚对他恨之入骨。如光是老奸巨猾八面玲珑的人，以日本帝国主义为支柱，凭借伪满汉奸的势力，巩固了自己的佛教地位，不断借宣扬佛法的机会为日本侵略者效劳。所以，伪满民生部授予如光以“长老”头衔，日本天台宗赠给如光以“权僧正”最高称号。由于如光的大力倡导，伪满佛教徒与日俱增。以张景惠为首的伪大臣、参议，连从不信佛的曾留学日本的伪交通部大臣谷次亨也潜心佛教，念起阿弥陀佛来了。

(摘自《伪满人物》)

基督教会 在伪满时期的遭遇

杨松山

我是1943年参加基督教会工作的，对于基督教会
在伪满时期的遭遇，感受颇深。

据老一辈人传说：日本入侵东北之初，不少教会人士都有不祥的预感，持着观望的态度，十分谨慎地安排工作。没想到日本人对于基督教会非但不给什么迫害，反而有些表示支持的迹象。比如：当时关内普通书刊，一律禁止流入“满洲国”，独有基督教会出版物可以大量流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上海出版的《时兆月报》每个月有数万份流入东北各地，日本海关总是大开绿灯，从未给予任何限制，而教会派出的推销书报的工作人员进入大小城镇，也一直是通行无阻，甚至主动拜访伪满的政府机关，向日伪官员推销书报，他们订了月刊，还在订报册上签名留念，以示支持。

事后分析得知：日本人刚刚侵入东北，还需要一个稳定局势的过程。他们不愿过早地引起西方世界的对抗，所以对西方传教士们和他们的正常工作，都是尽力表示友善的态度。而且基督教义的传播，对他们的“宣抚”言论，如所谓王道乐土，安居乐业等说教，是有利而无害的。所以当时日本人不加任何干涉，也有他们自己的打算。

在这样“顺利”的局势下，东北基督教各大宗派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广传福音的大好时机，传教活动都积极起来。在伪满开头的六七年内，各宗教都出现一个空前发展的阶段，目下各

地教会的老牧师们，大多都是这一时期所封立。有些地方教会和它的领导机构，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也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哈尔滨新阳路教会是此时开创的，北满区会和西满区会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

但是，好景不长。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人大举入侵全中国的野心已经下定。对于西方传教士在他的势力范围内横冲直闯，有些不舒服了，对教会的态度收起了笑脸，露出了凶相。便衣特务出入教会日益频繁，对教会活动无论大小都要过问，对“满洲”国籍的传道人员都要登记上册，对每一个人日常活动，也进行仔细的观察。但这时对正常的宗教活动还没有加以限制。

1939年日美关系开始紧张，日本特务对教会的监视加强了，但不直接触动外国人，只对中国传教士进行悄悄的打击。凡与西方传教士有联系的中国传道人员，都上了他们的黑名单，叫做“视察人”。当时的“视察人”分为两种，有可能搞刑事犯罪的人，叫“刑事视察人”；在思想上叫他们不放心的人，叫做“特务视察人”。他们还把比较重要的人物叫做“要视察人”，监视得更为严密。当时中国传道人员有不少都被定为“要视察人”，日子很不好过，有时被盯梢，有时被盘查，千方百计地给予各式各样的刁难。这时的传道人员在行动上都分外谨慎，尽量避免招惹是非，与西方传教士都保持距离了。

到1940年，日美紧张关系加剧了，日伪警特对教会监视更加公开化，跟踪盯梢越来越紧，事无大小，一举一动都要受到他们粗暴的盘查。

这时各地美国人、英国人开始回国了，哈尔滨浸信会的兰马丁在这时首先回国。1941年初，英美等国的政府都向它的侨民下达了回国的命令，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美国人，从沈阳、长春、哈尔滨各地先后撤走。哈尔滨北满区会会长美国人罗彬思

就是在1941夏天离哈回国的，由中国人徐棠清教士担任代理区会长。沈阳东北联合会会长美国人名叫吴德的也在这时撤走，由中国人牧师王福原接任会长。哈尔滨市浸信会接替兰马丁职务的美国人牧师孔卫道也是在这时奉命回国的。唯独在浸信会有一个名叫端礼宾的女传道人，不肯撤离。哈市神台会有一个名叫闻爱道的美国牧师，开头也做过这样表示，迟迟不走，不过在校晚时间，他还是被迫撤离哈市而去。这时在哈尔滨市的西方传道士只剩下浸信会的美国女传道人端礼宾和信义会的丹麦人牧师齐宝贵以及齐齐哈尔市约老会的美国女传道士孔罗瑞没走，其余的人已全部撤离。长春、沈阳各教会的美国人和英国人也都奉命而去。

这时日伪宪特不仅便衣人员，连身着军警制服，腰佩战刀的公开身份者，也大摇大摆频繁进入教会办公室，有意制造恐怖气氛。教会中有社会职业的中、青年信徒大多数都不敢来教会作礼拜了，只有一些老年人（多数是妇女）不顾一切继续上教会。由于信徒参加礼拜的人太少，奉献捐款自然也少得可怜，不少教会的附属事业也都无法维持，连工作人员的最低工资也无着落。一些担任次要职务的人，凡有社会工作能力的都纷纷离开教会，另谋生路去了。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打响了，日本人首先把哈市浸信会未撤走的美国女传道人端礼宾和齐齐哈尔约老会的美国女传道人孔罗瑞关入集中营。接着，对教会内中国传道人加紧了逼迫，日本人当时的政治口号叫做“击灭美英”，他们扬言基督教会的人都是一些英美脑瓜儿，非狠狠地整治他们不可。于是，教会更紧张了，传道人每天受到日伪警特的种种刁难，盯梢的脚步不离地公开跟踪，还对他们去过的人家进行盘问。问人家：“方才什么人来你家了？干啥来了？谈些啥？”像审讯一样，边

问边记，问完了还威吓说：“我要进行核对，如果发现你说谎，还要再来找你算帐！”搞得人们惊慌不安。据安息日会的人反映：在这个教会首先有宝隆洋行职员王惠生和道外济民产院助产士陈济民托人传出口信说：“可别让徐牧师来我家了！”接着有抚顺街铁路工人高桂馥，地节街铁路工人张同三也传来同样的口信。由于这样的口信越来越多，传道人士只好停止探望活动，对有社会职业的中年信徒一律不再探望。而专门去找一些穷苦的人家，比如安心街有一个傅爱理，安乐街有一个冯信生，这二位老太太都是给别人当过多年的老妈子，家中又穷，年岁又大，身体也不好，但她们都是新阳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老信徒，信仰十分虔诚，热爱教会，热爱众信徒。传道人一方面去看望她本人，也通过这些人向那些不敢来教会，又不敢接待传道人的信徒们传达口信，对一些需要在道义上给予帮助的人，间接地给一些帮助。有些人在个人生活上有难处，需要教会代为祈祷的，也是通过这些老年女信徒向教会传达口信。后来得知，其他教会在当时也是用这同样办法与信徒保持联系。

特务们看到仅仅跟踪，已经找不到什么材料了，就经常到教会公开出面找我们麻烦，利用一些编造出来的题目，对传道人进行盘问。有时把他们报纸上登的消息找出一段来，问我们看过这个新闻没有？这是一个很难为人的手法。有一次，一个经常监视我的特务到我办公室来盘问我，说一些闲话之后，忽然指出报纸上一则新闻问我：“你看过这个消息吗？”我看其内容是日本军队在关内什么地方取得一次很大的胜利。我当时无法估计他下句要问什么话，我想免去些麻烦就回答说：“没看过”。谁知这个特务马上变了脸，拍着桌子说：“你为什么不看满洲国的报纸？难道你还是只关心英美的事情吗？”把我狠狠地训了一番。

又有一次，还是这个人，又指出一段新闻，还是发出同样的问题。这一次的消息内容是日本军在太平洋上大败美国海军，而且日本方面毫无损失。我因总结上次经验，只好说看过了。他接着问：“你相信这个消息是真实的吗？”我说：“相信。”他又变了脸，还是拍桌子大叫：“你撒谎！连我都不信，你就信了！”还是狠狠训我一番。我心里明白，这样谎话是非说不可的，如果说我不相信，当时就有被抓思想犯的可能。总之，他是有意和我为难，能抓住把柄就大大治我一番，实在抓不住把柄，就摆个威风唬我一番，其目的就是要我知道他的厉害。

我被特务们训斥之后，心中很不舒服，晚间就找我的领导人徐棠清教士向他述说一番。徐告诉我：“你不用怕他们，过去他们找毛病的办法比这刁得多，吓唬人的话也比这恶得多，现在的逼迫劲头已经小多了。你再忍耐一段时候还会更好些，如今在沈阳已经建立了满洲总会，等到这个总会真正站住了脚，特务们就会再放松一些监视的。”这些话使我稍放些心，但仍然有些提心吊胆。

194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来一个满口酒气的特务，专门找我谈话，态度装得很和气，他说：“你们信教的人讲良心，我就顶有良心，去年有两个思想犯嫌疑者，上边派我和另一同事去调查。我调查这个人很够朋友，对我不错，他也真的没有啥大事，经我手把他的事给完了。另一个嫌疑者落在我那个同事的手里，也怪他当事人自己不会来事儿，本来也没啥大错，被我这个同事硬给问成个思想犯！干我们这一行可真是一言丧邦、一言兴邦呀！”

我明白他这是用酒盖脸向我索贿，我也用指桑说槐的办法，称赞他有良心肯行善的“美德”。又向他表示：“我本来是肯帮朋友的人，只不过上有老人，下有孩子，收入太少，实是一个

清贫无力之人，有些素待人了，可是一些厚道人也都包涵了我。”
就这样也就把一场敲诈应付过去了。

现在想来我这个办法在1942年是不好使的，正像徐棠清牧师说的那样，1943年确实是逼迫之风有些减轻了。在1942年上半年是教会恐怖气氛的最高峰，因为那时日本人在不少地方都下手抓人了，敲诈不遂也是他们抓人的原因之一。在1942年上半年，仅在哈尔滨就有浸信会牧师蔡约翰和圣洁会牧师杨在天先后被捕了，严刑拷打逼问口供。蔡约翰被审的题目是让他供出与美国人兰马丁的关系，他讲了一些教会内部的正常宗教关系，日本人不满意了。他们要的是政治活动关系，蔡约翰没干这些事，当然供不出来。他受了种种苦刑，精神、肉体都受到很大的摧残，因为实在查不出什么罪来，经过半年多的折磨，才把他释放出来。

圣洁会杨在天牧师也受了不少苦刑，与他同时被抓的还有日本人兼职牧师原雄一。原雄一的社会职业是哈尔滨铁路局人事科长。据说是因圣洁会东京总会的会长日本牧师不敬拜天昭大神，被抓起来。原雄一牧师表示的态度同东京总会是一致的，所以也被抓起来了。当时的日本宪法规定：“日本臣民以不违臣民义务为限，有宗教信仰之自由。”日本当局认为敬拜天昭大神乃臣民不可违反之义务；而原雄一和他的东京总会则认为：敬拜天昭大神是与自己的宗教信仰相违背的，因为圣经中十条诫命的第一条就是：“除了上帝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当时的日本当局以“击灭美英”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基督教人士被视为英美脑瓜，是需要严加整治的对象，借此理由镇压一番，是适合他们的政治需要的。因此，首先在东京圣洁会开始抓了人，这案件自然要波及他的满洲分会，在长春的新京教区表示顺从日本政府，他的负责人变成了日伪政府的“座上客”。哈尔滨教

区则坚持信仰，不肯顺服他的政府，因此当地负责人原雄一变成了“阶下囚”！原雄一蹲了二年多监狱才被释放。杨在天也蹲了半年多。原雄一出监后仍在铁路任职，杨在天出监后则回到他的原籍齐齐哈尔附近的江桥站另谋生计去了。

当蔡约翰牧师和杨在天牧师被捕期间，其他教会的牧师尽管没被抓去，但教会恐怖气氛并不亚于他们这两个教会。信徒中有些人禁食祈祷，有人天天痛哭流泪，祈求上帝保护这两位被抓去的牧师，也保护各自教会的牧师能得平安。在礼拜活动中，欢声笑语完全不见了。人人都是把脸绷得紧紧的，熟人见面打招呼都是冷冷地一点头就算完事，连彼此问候的话都没有了。事后得知日本人用的是两面手法，一方面制造恐怖气氛，使教会工作人员中的大部分被迫转业，使信徒中有社会职业的人大多数不敢来教会，把剩下的主要负责人孤立起来，以便于监视。另一方面又由协和会出面在各大宗派中酝酿建立满洲基督教会。通过这个办法，把日本牧师打进各教会中来，以帮助建立满洲基督教为名，实现他们监视中国教会之目的。

这时的东北各教会也正在“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设法到日本教会中寻找靠山。哈尔滨西门脸教会由武百祥出面，把日本教会牧师山下永幸请出来做他的顾问，以后又联系满洲基督教首领石川牧师也来帮助他。这时的信义会只好让步，承认了与武百祥的自立会搞联合，并把自己的牧师调往他处，接受了自立会牧师的领导。

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在沈阳的东北联合会，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体系和与众不同的信仰，不肯接受满洲基督教会的领导，也不肯加入他们的联合，乃从日本国的安息日会请来了小仓牧师，由他出面与日伪政府交涉，终于单独建立起安息日会满洲总会。还保留在沈阳的两个医院，用医院的收入可以在切断

外资供应的情况下，保持各教会传道人员的最低工资。小仓牧师办好这些事回国之后，中国牧师还是支持不了这个摊子，又向日本教会请求帮助。小仓牧师派来一个名叫伊藤繁美的小伙子，专门负责应付日伪政府的一切事务。这时的安息日会满洲总会有了着落，日伪警特来找麻烦，有日本人出面接待，经济上有两个医院的收入来维持，正常的教会活动还可照常进行。但教会的附属事业都萎缩了，首先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一开始，关内书报不能再进满洲，东北联合会首先撤消了书报部，哈尔滨的北满区会文字布道部也解散了，以书报长刘安祥为首的全体书报员都转业了，全东北的安息日会所办的教会小学一律关闭了，只保留沈阳东陵一个中学。

1942年，是日伪逼迫教会最紧张的时候，安息日会有些外县的地方教会传道人，放下教会转业而去。各地信徒纷纷来信，请求区会帮助。这时区会正有一批被解散的书报员无法安排，乃挑选一部分适合的人员派到各地去填补教会的空缺。也有一部分人转到社会上去工作。

哈尔滨圣洁会于中日两国牧师被捕期间，教会并没有关闭，有一名叫邢国书的男信徒主动站出来维持教会残局。邢的教会职务是一个“执事”，义务管理教会的一切事务，甚至在最困难时，以自费支付教会的房租。

哈尔滨各宗派除安息日会之外，联合起来建立了满洲基督教会的分支机构，叫做满洲基督教北满教区，由端街卫斯理教会牧师张海云任教区长，呼兰县长老会牧师孙耀宗任副教区长。这时的真耶稣教会看见安息日会可以自成体系单独成立总会，他们也不愿与众教会合并，乃出头去找协和会要求建立独立的真耶稣教会，几经交涉未得应允。协和会的日本人认为他们不够条件，不能单独建立总会。后来有人出主意让他与安息日会

联系，建立两个教会的联合总会，而安息日会对此没同意，交涉几次直到日本投降也没谈妥。

满洲基督教会建立起来之后，各个地方的分支机构相继成立，各教会才逐步稳定下来，正常的宗教活动还可勉强维持。但恐怖冷清局面仍未改变，信徒中还有许多人不敢来教会，传道人生活也都十分艰苦，小规模的迫害仍然在各个地方不断出现，全东北基督教会就是在这样恐怖冷清局面下，在百般忍耐中迎来了祖国的光复。

（摘自《哈尔滨文史资料》）

披着宗教外衣的释善果

孟享麟

释善果俗家杨姓，他的父亲曾是民国前期的一个县官，父母死后，善果流落到河北省滦县古野乡的龙泉寺里，善果就在这里出家了。1926年老和尚送善果到北京弥陀佛学院学习佛教知识，学习期间赶上广济寺传戒，善果就在这里受戒了。受戒后继续在弥陀佛学院学习完了，于1929年进入柏林佛学院学习三年，以后到宁波弘法社学习，1933年又到青岛湛山佛学院，在这里认识了长春般若寺的创始人倓虚。

1936年伪满新京（现在的长春）特殊寺庙般若寺准备传戒，倓虚是戒场的得戒和尚，当他前来主持传戒时，就把善果带到般若寺来给他一个“戒场引礼”的职衔。不久又把他安排为般若寺的首座职位。1937年在倓虚的允许下又担任了般若寺的方丈。

1938年夏，善果随佛教代表团参加日本天台宗1050周年开山纪念庆典，这个代表团是由日伪当局挑选的。代表团在日本活动期间，日本佛教界头面人物梅谷孝永对代表团全体人员说：“日满两国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佛教本来就是一家，我们佛教能够有今天这样辉煌成就是和天皇的嘉护翼赞分不开的！凡是做一个佛教徒的都应该忠于天皇陛下，努力完成大东亚建设的共同使命！你们满洲做得比较好，还要继续维护发扬，对日满提携和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做出顶天立地的贡献！”

庆祝式典完了后，由天台宗总务厅派人率代表团到东京、大阪、神户、京都、奈良等地参观有关的政治经济设施、工矿企业的生产管理情况以及名胜古迹等等，还到日本最大的海军基地横须贺参观游览，往返耗费了25天时间。

善果于1940年充当了日本大使馆的情报员，领导善果的特务头子是山口，山口有时到般若寺来找善果，秘密进行特务活动。

由于日本方面的推荐，善果还充当了日本天台宗总务厅的教学部长。伪满佛教总会成立，善果当上了新京佛教支部长。

善果利用佛教讲坛，如在般若寺讲经、办法会或召开佛教徒会议的时候，善果首先宣传什么伪满“建国精神”：“日满一德一心，八纮一宇、共存共荣”等等。

伪满每月8日为“诏书奉戴日”，善果为了讨好日本帝国主义的欢心，这天都是召集全体佛教徒在般若寺大雄宝殿内照例举行。仪式开始时首先向日满两国国旗行礼然后面向日本方面举行宫廷遥拜，再转过身对皇室遥拜，接着由善果捧读诏书，有时善果还亲自讲话，要求佛教徒惟恭惟谨地效忠于日本天皇陛下。

善果于1940年担任了伪满监狱的“教诲师”，1943年，善

果有一次到新京监狱平治街分监对那里的所谓犯人颠倒黑白地说：“这个国家对待犯人有多么好呀！这里不像监狱，和学校一样，还能够学到一些手艺，将来出去也有自己的生活出路，大家要安心在这里，别生旁的妄想，尽量地多做善事，多种福田！”

善果还讲些佛教中“因果的存在”和“世间的幻化”，叫这些人追求来世的幸福。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善果在伪国兵入营时召集全体佛教徒举行仪式，善果讲话说：“日本皇军为帮助我们建设一个自由的新天地、巩固大东亚的新秩序，圣战早日完遂，有赖于你们青年大显身手，你们应该和亲邦日本携起手来，为完成巩固国防的光荣任务而努力！”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逐步发展，日本侵略军伤亡人数有增无减。善果在每月4日除组织佛教徒到车站接日本遗骨外，对日本侵略军的死亡人员还举行隆重的慰灵祭。有时到“忠灵塔”举行，有时在般若寺举行。在举行仪式时，日本侵略头子和伪满汉奸都亲临仪式，表示哀悼。善果就率领僧众诵经，回寺还不断祈祷皇军的“武运长久”和“大东亚圣战”的早日完遂。

太平洋战争进入紧张阶段，日本的战略物资极度缺乏，建筑用的金属器材，如门窗柜箱上的铜器都相继拆下，就是市面流通的铜质硬币也换上了代用品——钢质硬币，香烟的包装纸也做为可贵的材料予以收回。善果为了协助日本帝国主义收集战略物资，就在佛教里开展一次献纳金属活动，特别是铜器和铁器要毫无保留地一律奉献。佛教徒在这次行动中不仅对寺庙里存有的金属器材全部献出，而且还到街道里进行广泛宣传，给日本帝国主义提供更多的战略物资。

1944年夏，日本帝国主义搞了一个决战体制下的生活简素化运动，善果积极参与，除在佛教内部召开会议具体布置外，还

以公函形式通知各寺庙一律遵照执行这个生活简素化运动对妨碍战力增强、消费大量物资、影响交通运输、多人一起集会等必须严格禁止。就是彼此之间赠送纪念物品也要取消。

1945年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更加疯狂紧迫，有朝不保夕的局势，善果又动员全市青年尼僧教徒组成了国防妇女会，帮助日本侵略军做各种义务劳动。国防妇女会的成员，身上披着白色布条，上面印有“国防妇女会”字样，有时集会接受日本人的检阅。善果强调“这是关系到大东亚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国防妇女会的成员一定要效忠于日本皇军，为皇军多做一些后勤工作，尽到我们的赤诚！”

在伪满佛教总会的指示下展开了献纳佛教号飞机的活动，善果当时宣传说“佛教徒虽不能拿起枪支到前方打仗，也应该给打仗的人送些利器，捐献佛教号飞机是佛教徒支援圣战的一点表示！”在善果的积极动员下，全市佛教徒完成了捐献任务。佛教总会也及时购买飞机一架交给日军使用。

1935年善果在青岛湛山佛学院学习期间，就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当侯虚要带领善果来长春般若寺时，国民党反动派就对他在东北地区发展特务组织开展秘密活动做了布置。善果到般若寺后，首先打入日本大使馆做情报员，用日本情报员的身份来掩盖国民党的特务活动。因此，善果能够长期在佛教界隐蔽下去而没有暴露自己，原因就在这里。

1942年般若寺传戒时，舒兰县兴福寺的湛融、湛光师兄弟二人前来受戒，在戒场中，湛融吐露自己曾在冯占海部下当过义勇军，因和日本关东军遭遇交锋，失去联系而出家了。

善果曾多次利用宗教特权对湛融进行威胁利诱，湛融也看出善果是日伪的亲信，认为靠近善果也能对自己有所庇护，也就一拍即合，从此湛融就跳派而认善果为师了。善果就把湛融

改名为律光，这是善果在佛教徒中发展的特务爪牙之一。

伪满军校里佟某，也是善果发展的特务分子，善果介绍律光和佟教官认识后，两个人经常秘密集会进行特务活动。

善果在东北地区给国民党做特务活动所需要的经费，是由国民党特务机关那里通过私人名义汇拨过来的。伪满时期，善果在银行里有私人存款一万多元。1940年的一天，银行的货币管理人员到般若寺来核对存款数目，当时会见了善鸿监院，善洪回答：“我们庙上没有这许多存款，你可以直接问问善果。”这位货币管理人员和善果核对清楚后就走开了。事后善果为了掩盖这笔特务活动经费，向善洪一再宣称：“银行把钱弄错了。”

善果在伪满时期，为了得到日本帝国主义和一些汉奸走狗的赏识，积极主动地和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傀儡皇帝侍从武官长张文铸、伪协和会参事板井荣三郎等勾结在一起，因而和汉奸家属过往较密。当日伪统治宣告结束，苏联红军还没有前来接管的时候，张景惠的七老婆把四十几箱细软物品和金银珠宝等托善果代为保管，张文铸的老婆也寄存物品十几箱，还有辛九丹的女儿也在善果手里寄存东西，日本东托理事冈田猛马的东西也交善果手中，他们认为善果是国民党的亲信、寺庙又是一个可靠的隐蔽场所，把东西寄存这里万无一失的。而善果接受寄存物品也有个人的想法，就是准备从中大捞一把。

当时一般群众对般若寺的传说比较复杂，有的认为般若寺存有大量财物，应该大家公用；有的认为般若寺竟给汉奸寄存东西，应该没收交给群众处理。张景惠和张文铸的老婆知道风声不好，就向善果提出要起走寄存物品，由于善果从中大捞一把的计划还没有得到实现，因此百般阻挠他们不许把东西拿走。以后张景惠七老婆去找汉奸蒙旗头头德楞歌向善果求情，希望允许把东西拿走，在这种情况下，善果和成山二人当晚在地下

室里呆了一宿，亲自动手翻箱倒柜，从一箱箱物品中挑选最珍贵的东西放进自己库里，转手之间就变成善果个人的财物了。

善果当日本大使馆的情报员，给国民党做特务活动，同样职务却是为了两个主人。而善果的特务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直接调查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把党的组织和工作情况分别报告给日本大使馆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

律光被善果吸收为国民党特务之后，紧紧依靠善果的日本大使馆情报员的身份，先后和日本宪兵队、伪满警察厅的特务厉宗元、张効九、东宪补等接触认识，并经常在一起打交道，有时律光把这些特务找到般若寺来，以吃喝玩乐为名，秘密地向他们汇报有关佛教界的情况。

律光充当国民党的特务后，生活极度腐化，经常和一些女流氓混在一起，有时在街上坐车，两边都陪伴着女人。九三胜利后，有一位姓徐的女人来找律光，并且宣称“律光说自己没有老婆，要和我长远相处。”类似这种情况很多，这里就不更多的列举了。

善果、律光和一些特务分子在一起打交道，他们丝毫不像佛教徒，吃的是猪牛鱼肉，喝的是各种美酒，时常和特务汉奸摆设宴席，猜拳行令，并在宴会完了，拿出鸦片在一起吸毒，因此善果和律光不是什么出家人，而是披着宗教外衣为非作歹的特务分子！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参事板井荣三郎，在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就到般若寺找善果求救。善果当时拿出一套僧装给他穿上，脖子上挂串捻珠，手里还拿串捻珠，摇身一变竟伪装成般若寺的和尚。在苏联红军还没有进驻长春时，一天，善果亲自把大汉奸张文铸领到般若寺来，把准备好的一套僧装给张文铸穿上，善果和张文铸就坐上般若寺的马车，由成山赶车，直往伊通而去，扮演了一场“真和尚”领“假和尚”逃

跑的丑剧。他们在伊通隐蔽半个月左右，以后听风声还不是那么紧张，于是就从伊通回来了。

一般群众当时对善果的反动臭名轰动很大，都传说善果是国民党的少将，还要当国民党的长春市长。不久，蒋介石亲信，国民党青岛市长沈鸿烈来长春会见善果，转达特务机关在东北地区开展特务活动的指示。善果对前一阶段的活动也做了系统的汇报。沈鸿烈在长春就住在国民党东北行辕里，善果还在国民党党部设宴欢迎沈鸿烈，当沈鸿烈完成特务布置之后，分手时，善果把一个珍贵的古玩“翠玉香炉”做为礼品送给了沈鸿烈。

沈鸿烈来长春又一个主要任务是转移善果的特务关系。通过沈鸿烈的介绍，善果和国民党东北区最高特务机关——东北行辕建立了联系。同时善果又介绍戒尘、王新民等为东北行辕长春情报组的谍报员。

善果凭借国民党的特务关系当上了佛教东北九省特派员的反动职务，善果为了施展自己的反动本领，亲自去见国民党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求他给般若寺写一张手谕，大意是“不许驻军和各地官兵到庙院搔扰，违者法办！”这张手谕就贴在般若寺门前。这一时期和善果比较接近的人们，企图攀附善果的反动势力，弄个一官半职。连伪满民生部大臣也对善果说：“这回日本垮了，你该出头了，给我帮帮忙吧！”日本投降后，善果利用“保管委员会”的职权还接管了一些日本寺庙，把日本寺里比较值钱的东西都变卖归己了。并派熙瑞驻东本歌寺，丐僧驻西本歌寺、湛光驻妙心寺，看管这些寺庙。

1951年，冒名顶替的善果在北京极乐寺被逮捕归案。

九台县宗教界 参加过的一次“炼成会”

马清奎 释洞辉口述
杨树春整理

伪满时期，九台县宗教事务统归九台县公署教育科的礼教股管理。当时的股长叫黄金库。那时全县共有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5大教派。寺庙道观城乡都有，教徒较多。天主教堂、基督教会均设于县城内。当时，天主教在我省划分6个教区。本县属吉林教区，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九台铁北设有教堂一处，每周的星期日，即“主日”都由长春市四道街天主教堂法国神甫纪怀德（中国名）前来主持宗教仪式，作“弥撒”。平日由当地住会教徒管理，解放初尚有修女3人。基督教有教会两处。一处是铁道南信义会，原属丹麦“差会”，是民国时期传入九台的。开始时的传教士是丹麦人。伪满初期这个人走后，由本地传教士王更生继续主持活动，解放初教会自行解散。另一处是铁道北“复临安息日会”，原属美国“全球总会”传教区。解放前在我省设吉林、延边两个传教区，分别管辖全省13个教会。九台先后有过冯成钧、蔡一臣、肖子馥等传教士。两处教会大约共有四五十名教徒。

佛教、道教在城乡各地共有寺庙17处（由村民管理的关帝庙除外），和尚、尼僧、道士二百八十多人，九台镇浴泉庵就有49人。本县佛教以禅宗五家之一的“临济宗”为最多，其次是禅宗的“曹洞宗”。道教有全真道和伏居道（又名正乙派），我

县以全真道中的“龙门派”为最多。

伊斯兰教是回族信仰的宗教，因此，在我县凡是回民聚居的村落都设有清真寺，料理婚丧习俗等各方面的宗教事务。教派属于逊尼派的四大教法学派中的哈乃菲学派。

上述这些宗教，在当时和我县群众联系较广，影响较深。因此，被日伪统治者视为不可忽略的一大问题。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同时利用宗教来发挥影响，便在他们将要灭亡的前夕，1945年4月，召开了一次全县宗教界的“炼成会”。参加会议的有佛教的监院、知客、部分和尚、尼僧；伊斯兰教各清真寺的阿訇（也称教长）；天主教的修女；基督教的牧师、传教士；道教的道长、部分道士，共四十多人。会开了7天，伙食费自己拿，并由各教自己办伙，住宿分别在九台镇各教的寺、庙、堂。总之，只管开会，不管生活。

开会期间，不管各教信仰，每天早晨都必须唱伪满“国歌”，之后，先遥拜“天昭大神”，再遥拜“皇帝陛下”，背诵《回銮训民诏书》，还得做“建国体操”。会的开法，头三天劳动，到苗圃刨树苗，后四天训话。

召开这次会主要是针对当时太平洋战争日本已面临失败的局面。1944年以来，美国飞机轰炸日本海军和日本国土，关岛日本陆军守军“玉碎”等“大东亚战争”中日本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播。在这二年来，中国人已经流传着“日本话不用学，再待三年用不着”的顺口溜。统治者企图加强战争宣传，推着中国人继续跟着他们作最后的挣扎。训话人是协和会的干事长。他是日本人，名叫三岛武合仁。讲的内容还是“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等一些老调重弹；并且具体讲了五个字，即“贫、贪、病、弱、愚”。说来说去，还是污辱中国人“东亚病夫”、愚昧落后”。还说要想解决，就必须“日满亲善，一心一德”妄想

通过宗教界向中国人说教，相信大东亚战争“胜利”，别听所谓的“谣言”，还特别强调会后一定要向本教徒宣传讲说。会议临要结束时，叫我们每个教派推举一人，互相介绍了本教的情况、基本知识和信仰宗旨。开会之前，有的人怕官方找小脚，还得先给他们送礼。会中道教的吴明刚因强嘴顶了他们，就挨了两个嘴巴。大家暗中议论，可得注意，别吃眼前亏。

(摘自《九台文史资料》)

披着佛教外衣的 女特务——刘沿航

王青春

1931年冬，家居五常的原长春普化教会宏愿师赵化南，从长春总会领命，在五常成立了“新京五台山普化佛教会五常筹建处”。不久，他召集镇内外的一些头面人物，选举产生了以赵化南为主任的“五常普化佛教会”，从此，佛教开始传入五常，信徒日益增多。到1935年，信徒已达6000余人。1937年，在赵化南去五台山朝圣归途命丧长春时，长春总会会监王纯轩又派一名叫刘沿航的女佛主来五常主持“佛教”，重兴道务。

猪圈内降生的“佛主”

1917年4月的一个深夜，在吉林省伊通县海山镇李家屯，王兴夫妻正在自家猪圈内守候母猪产仔，王妻久孕的身子也到了分娩期，当即在猪圈里生下了一个女婴。孩子的哭叫声惊动了一名笃信佛教的邻居老李头。李老汉便宣扬说：“无生老母昨

晚借王兴家的母猪身体临凡了”！此事越传越远，传到了岭西刘兴春、刘铁侠的一对佛门信徒家中，感到这孩子将来是一座金山。于是，几天后，便到王家讨要孩子。王兴夫妇因家境贫寒，无力喂养，就把这个女孩送给了刘兴春老夫妇。这个女孩就是后来的刘沿航。刘兴春、刘铁侠这对既信佛教，又靠佛教发财的夫妻回村后，大肆宣扬小孩是“佛主临凡”，动员远近的会道门头子、佛教信徒们，向佛主“献养身钱、送降福金”。当刘沿航10岁那年，她的养母刘铁侠以刘沿航“无生老母”兼坛主的名义，自命为会长，成立了“普渡教会”，四出拉人入教，组织献纳活动。发财后，养父刘兴春酒醉死在县城一个货店里，养母被日本兵轮奸后自缢身亡。刘沿航投到一个姓金的二姐家中。刘沿航便用会道门的手法在他二姐家为人看病，很快又名声大振。有一天，从北平五台山佛教会来了一个名为传道，实是国民党中央特务的名叫施友生的人，也拜刘沿航为“无生老母”，并请她参加教会。后经施友生介绍，由其姨邓史氏陪同去北平，投奔了北平天主教教主国民党党员、中统特务李静，并住在刘沿航的老姨家，其姨夫陈明是北京市警察局的中统特务。经过几次考验，这些身披宗教外衣的中统特务，感到刘沿航人精貌美，很有培养价值。陈明和刘铁云就把刘沿航带到浙江省海定县的佛教圣地普陀山的一个名为学校，实为国民学特务的训练基地。刘沿航在这里开始接受特务培训。所学的内容是：反苏反共，拥蒋亲美。在军事上学习陆军战术、看图测图、航海、侦探、化装、跟踪、收发报、爆破、暗杀等特技。刘沿航除学习上述科目外，还由专门教员训练与男人握手、接吻、拥抱及卧床等课程。三年后，刘沿航在这里毕业，并由其姨刘铁云介绍加入了国民党的三青团。与陈明、刘铁云、黄贞四人一起回到北平的李静处。当时，我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已胜利到达

陕北，东北的抗日联军也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刘沿航、邓史氏、黄贞三人受李静的派遣，带着打入抗日义勇军，瓦解军心，向侵华日军妥协，破坏我抗日救亡运动的反革命目的窜回到吉林省伊通县落山镇——刘沿航的老家，以传教的名义，开始了反革命的活动。由于我党领导下的东北革命形势很好，群众抗日反蒋情绪高涨，刘沿航等人的反革命活动无法施展，在1935年的，刘沿航便与邓史氏来到了长春普化教会，找到了会长王纯轩。王纯轩见到刘沿航年轻俊俏，便以推荐刘沿航为“圣母”的手法，奸污了刘沿航。刘沿航被奸怀孕后，正赶上五常教会会长去长春请命，于是王纯轩便把刘沿航派遣来五常做“圣母”。这时，邓史氏才正式告诉刘沿航：“王纯轩、你姨刘铁云、你姨夫陈明都是国民党的中统特务、国民党的党员，我和王纯轩决定介绍你加入国民党。”刘沿航就这样披着宗教的外衣，以办教的形式来五常从事反革命活动。

刘沿航来五常办教

1937年，五常县以秦凤轩为首的佛教信徒们把刘沿航这个“圣母”接来了五常。秦凤轩把她安排在自家的一个不大不小，且很明亮的下屋内，派专人伺奉。秦和刘沿航商定，举行一次“十字真经”讲演会。为了骗取钱财，证明刘沿航是“圣母”，秦凤轩请来镇内的一个外科医生，在刘沿航的背上和臂部刺上了“月亮”和“星星”，就是象征“披星戴月”，是“圣母”的标志。为了更多地迷惑信徒，多骗钱财，讲演前几天，秦凤轩从沈阳教会请来了贺宝善等三个董事参加演讲，还张贴告示，雇来一个欢乐班子，吹吹打打，大造声势。

讲演这天，在信徒进门时，秦凤轩让进门人往路口扔钞票银元，说是给“圣母”扔铺路钱。讲演开始时，在刘沿航的贴

身两边站立四“佛童”。她靠多年的特务训练和骗人伎俩，伴以喜、怒、哀、乐，大肆宣扬佛教，迷惑了一些信徒。信徒们都往她手里塞钱和小件珍贵物品，求她降福灭灾。讲演后，刘沿航为证明其是“佛祖”选几个老年女信徒到内室，刘扒下衣服让大家看她身上的“星”和“月”。这就迷惑了更多的人，由此名声日高，后被推举为五常县五台山晋佗佛教分会“祖师”。

刘沿航、秦凤轩等人的骗人第一招术得逞后，她们财欲熏心，骗钱活动更加嚣张。秦凤轩把刘沿航讲的佛教内容编成“无生圣母”《经文》卖给信徒。刘沿航还按五台山“东、西、南、北、中”五台形式，把施舍多的信徒封为会主，组织他们发展信徒，开展捐募施舍活动。刘沿航搞了一个“黄鸡号”的样式，油印了上万张，以每张三角伪币卖给信徒。开办“装盘”活动，用二尺黄布，印上车轮样，称为“车轮天盘”，写上360个信徒的名字，在佛像前举行仪式，然后将盘表用火焚化。

刘沿航在五常从事反动佛教活动期间，还和秦凤轩的儿子秦绍新（中统特务）结为临时夫妻，后因未婚生子，秦家感到脸上无光。为了欺骗舆论，挽回面子，秦凤轩找来照像师，为刘沿航母子照了合影像，然后把孩子害死。秦凤轩和刘沿航让信徒们出钱买像供奉“双佛主”，继续骗钱。

后来，刘沿航和秦凤轩的骗财招数逐渐被信徒看穿了，信徒和施舍的人越来越少，刘沿航感到在五常不能久留，便于1938年4月的一个深夜，带着所骗的大量财宝，到长春由王纯轩办了一张可出“满洲国”的护照，返回了北平李静处。

再潜东北从事反共活动

刘沿航、秦凤轩窜到北平后，受李静的指派，仍以宗教的名义在大学生中、各教会里和机关中调查潜伏的中共党员。不

久，就有大学生蔡法权等三人被敌人杀害。后李静任命刘沿航为中统局东北组副组长，到沈阳大同佛教会长期潜伏，后经该会副会长、日本人如野介绍到哈尔滨大同佛教会担任妇女部长，这时，刘沿航已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统局组长和日本人操纵的满洲国滨江省大同佛教会妇女部长的反动头目。开始，日本人对她有些怀疑，后经日本宪兵第四团特高课长野田一郎的多次考验，才对她相信不疑。刘向日本人许诺，帮助大东亚圣战搞捐献飞机款活动。日本人为她安排了舒适的住房，从此，她经常化装出入商店、饭馆、剧院以及各教会，侦察我党和东北抗联的活动情况，跟踪有反满抗日情绪的人。经刘沿航提供线索，日本人在哈尔滨逮捕了二十几人，多数被日军杀害。

为了效命日本侵略者，刘沿航在哈期间，还纠集了长春、沈阳、丹东、鞍山等城市的40家教会头子，来哈搞捐献飞机款活动。

1945年4月，她在日本特高课长野田一郎等人的陪同下来五常，下令汉奸朱福三、王维伦、蒋松年等人，完成了捐献一架飞机款任务。刘沿航还以自己的名义，向日本侵略者捐献了两架飞机款。日本昭和的叔叔别愿大法师来哈时，亲自为刘沿航签署了一张“各地军警不得阻行”的特别护照，刘沿航效命日蒋名声大震，伪中央政府军事部大臣邢士廉亲授奖状一张，在滨江区第四军管区司令李文龙处也授了奖，登了报。

1945年“八·一五”光复日本侵略者投降时，刘沿航指挥日本人炸掉了我军从日军手中缴获的香坊军火库。她亲自为日本特高课长野田一郎换衣化装，并掩护逃出哈尔滨。她把日本人留下的12支手枪、1部电台匿藏在太平桥陈宝德家，并下令说：“宁可烂掉，也不能交给共产党！”

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刘沿航在哈与郭师桢等人组建了“挺

进军”、“光复军”，继续效忠蒋介石，并被委任少将政委。

1946年3月至1949年祖国解放期间，刘沿航一直活动在沈阳、丹东、辽中、北京等地，继续以宣传佛教的形式，担任国民党军、中统特务要职，刺探我党我军及北朝鲜和苏军情报，为国民党效劳。1949年北京解放时被捕。1950年被沈阳市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55年被解回五常后转省公安厅处理。

（摘自《五常文史资料》）

对少数民族的奴化

铁蹄下的十四年

——记日寇在喀喇沁旗的暴政

乌秀青

1933年日寇侵占热河，喀喇沁旗沦陷。在日本统治、蹂躏我旗的14年中，掠夺了大量的物资，奴役我旗人民，奸淫掳掠，压榨奴役，无所不用其极，使我旗蒙汉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我是喀喇沁旗公爷府村的协和会长，耳闻目睹了日伪的滔天罪行。

日伪侵占热河，喀喇沁旗沦陷

1931年（民国20年）9月，日本军炮轰沈阳北大营，一夜之间沈阳城全被占领，当时喀喇沁旗的上层闻听后，毫不关心，当作新闻笑谈，还是照旧寻欢作乐。张林阁作寿，依然大排筵宴，陈子善出殡，照旧宾客盈门，吊唁如市，不知国亡的危机。

日本侵占沈阳后，又分兵进攻安东、营口、长春等地，不到3个月，奉吉黑三省数十座城市、3 000万同胞及无尽的宝藏，完全被日寇控制。1932年（民国21年）8月，两架日军飞机在赤峰低空散发传单。传单大意是：日本已占领东北三省，成立了满洲国，用大同年号。不久将出兵热河等等。在这两架飞机低飞时，赤峰驻军崔旅（崔兴武的部队），不但不敢回击而且将旅部门前牌子摘掉，士兵都隐藏起来。绅商界人士，也只矢口空谈国事，不谈如何抗日。在此敌军压境，国难当头之际，喀旗乃至热河却一点防备都没有。日寇建立伪满洲国后，扬言热河是满洲国的一部分。长城各口为伪满的国界。日寇侵占了山海关，接着就向热河推进。当时，喀喇沁旗秩序很乱，盗贼四起，官匪勾结，骚扰商民。热河汤玉麟接到一份华侨捐献的救国自卫款，中饱私囊。为掩人耳目，派他的副官乌古庭（喀旗人）招兵买马，成立“抗日救国自卫军”。乌古庭奉命来喀旗公爷府招兵，由他亲属高占奎在喀旗东部招来一连兵，作为亲兵。队部设在公爷府小大庙，挂上“热河‘××救国自卫队’”的牌子。自卫队规定，凡能自备枪马，不论什么都可以参加，队部负责保护，因此经常发生劫马、缴收枪支等事件。有些绅商地主如于景宸、姜益斋、刘雨泽、云逢山、吴边科等投军后，被委任营长、连长、参谋等职。背着匣子枪，好几个马弁，耀武扬威，他们不为了抗日救国，而是为了当官老爷，身穿军服，欺压百姓。日本进占赤峰后，这些人不是逃之夭夭，便是偷跑回家。姜益斋本是公爷府的大绅商，兼有土地、商铺，财产很多，他向日寇交出手枪一支，马一匹及许多烟土，便回家不干了。于景宸、云逢山等撤出不远，也都开小差跑回。乌古庭退至沽源，也投降了日本人。

1933年1月，日寇侵占山海关，向热河、赤峰进攻，2月4

日（旧历正月十四），东北军（当地人称吉林队）向西逃跑，由喀旗路过，对旗民大肆抢劫、骚扰。百姓惊慌失措，四处藏躲。还有孙殿英的队伍，才到赤峰就遇日军进攻，一触即溃，分两路往回逃跑。一路逃向围场，一路逃向喀旗，狼狈不堪。日军装甲车、汽车向围场追击，在晋升太烧锅院内，死伤若干南军（孙广英部）和商人农民。喀喇沁旗这一路没有被日军追赶，可也是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公爷府和街里居民纷纷逃避一空，商店都关上了门板。

国民党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惊慌失措，用200余辆汽车装私产及鸦片运往天津，后抛弃省城承德向滦平逃命。日寇180人，兵不血刃占领承德，7天时间即占领热河全省，喀喇沁旗随之沦陷。

强化治安，建立统治机构

日本占领热河后，为了集中力量进攻华北和充实后备力量，建立伪满基地，首先维持地方治安。赤峰日本军召集地方有名望的人开会，喀喇沁旗的陈子善、邢宜庭应召到赤峰参加会。他们二人回旗以后，按日本人的指示，首先在喀喇沁旗成立保安总队，陈子善为总队长。乡镇成立保安分队，张林阁为公爷府分队长。把王府及巡警保甲的枪支拿出来武装保安队。

成立伪旗公署

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当了傀儡皇帝改元康德。为了便于统治，日寇将原东北三省及热河划为20个行省，设立县旗公署。1934年施行旗制，成立喀喇沁右旗（东部仍是建平县），将喀喇沁右旗公署设在旧王府衙门西院（西仓）。当时贡王之子笃多博在日本留学，邢宜庭代理旗长，陈子善为总务科长，他们的亲

信担任科股长等职，参事官是若林。名义上旗治，实际日本人说了算。他们将王爷府衙门前的广场，开辟成街道。王府的权贵们廉价买到地基，修盖门面，开设商店，建筑房宅。公爷府、上瓦房的投机商人都来王爷府开市营业。这里骤然成了小街镇，还有百货商店、印刷厂、旅馆、饭庄、邮电局、兴农合作社、警察署、派出所、村公所、协和会等，也很像个旗所在地。

旗保安队是地方武装，没有正式建制。为了统一领导，将保安队改编为治安队，统归治安部集中领导。喀喇沁旗为第三连，驻王府大庙八家。队长吴久荣，教官高桥（日本人）。公爷府镇为第二连驻商会院，纪律很坏，依仗日本势力，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强霸妇女。

治安队全队出发到各地缴私枪，由西部转到东部，旺业甸、王爷府、公爷府、大新乡、黑水、西桥、哈道口、坤德苏等地都留下他们残害、欺压旗民的足迹。1936年，撤消治安队，充实警察，淘汰的队员挑选一部分编入兴安军。这才给喀喇沁旗人民除了一大祸害。

扩充警察，健全警察机构

1936年（康德4年），在王爷府旗公署训练了一批警察，几个月后分配到各地。这算正规化的警察。警衔分警佐、警尉、警长、警士，他们身着黄呢子服装，头戴大沿帽，再佩上警衔徽章，腰挎洋刀，足登马靴，很是威风。喀喇沁右旗西部设三个警察署：七家警察署（茅荆坝前）、王府警察署、公爷府警察署。六个分驻所在安丹沟、旺业甸、小牛群、龙山、于家营子等地。署长的权力很大。署长上任，地方商民迎风洗尘，调转时也同样大排宴席饯行。过春节，地主老财，商店老板都去拜年，带着几百元钱，给署长的孩子作压岁钱。如公爷府警察署长郭子

良调转时，公爷府绅商送行钱礼就有七八百元。平时警察到商店，吃喝抽大烟，赊欠借取，有借无还。乡村的中小地主也竭力巴结警察。给警察种鸦片，每村都有××警察的烟地，耕种割浆，都是义务。龙山分驻所长吴兴汉，原是流氓，自当所长后，几年光景暴富起家，在公爷府街修起了四门斗瓦房院。

警察什么都管，清洁卫生、赌博、私贩等。他们无恶不作，常常借故对商民敲诈勒索，任意打骂、扣押。商民畏之如虎。一年查两次户口，每到乡村，白吃白住，大肆骚扰刁难百姓。另外，警察署还把16岁以上的公民集中到警察署照像，填写姓名，发良民证（身份证明书）。照像、填写证书，都按次序，稍一疏忽，连踢带打。老乡说：进警察署一趟，如进阎王殿一样。

各警察署配备了日本警尉。初任公爷府警察署的日本警尉是三吉正雄，他助长警察欺压百姓，还经常以搜查烟土为名到老乡家翻箱倒柜，坑害良民，污辱妇女。三吉走后，又来了一名日本警尉千叶，他好喝酒、好打人。有一次去四十家子，吃酒大醉，骑老乡的毛驴过河，将手枪丢失，硬说掉在河里，让警察在河两边堵截行人打捞，每人下水摸20分钟。第二日，在小府山头河边，又截住行人强迫入水摸枪。时值10月，天寒水冷，怎样求情也不行。不下河便打。如此二日，入水的人数达200余人次。最后一名日本警尉叫丸旦，在公爷府警察署连任三四年，啥事都管。村公所以及其它机关，都受他监视。还组织特务，搜集情报，管理鸦片征收，统制物资等。本街许多商民受过他的迫害。如开车驮店的杨珍，有一次代客商推销了2斤棉花。丸旦知道后，把杨珍叫到警察署长室，打了200竹板，押在拘留所，并使杨珍、小贩、买主三方受罚。

施行街村制

1937年（伪满康德5年），开始施行街村制。喀喇沁右旗西部的七家、旺业甸、王爷府、公爷府、龙山、小牛群六村子建立了村公所。每村设正副村长各1名，助理员1名。下设6个系，掌管村政。有行政、财务、烟政、劳务、民籍、义仓等事务。当时，每亩地征收苞谷五合，每村都有仓库，集满苞谷。一村有若干甲，每甲有甲长，甲长下有牌长。征收烟税、缴鸦片、收亩捐、派劳工等，村长说了算。大小官员贪污腐化，作威作福。旗烟政科长杨润田贪污1000余亩鸦片税；大溝号主任左翰章、石跃武（二人均是大商店老板）贪污鸦片2000余两；后被若林参事官发觉，把3人送至赤峰检查院禁闭3年，追赃后释放。

总之，自街村制施行以后，喀旗蒙汉人民，担负苛捐重税，受尽日本人的凌辱和地方权贵的剥削，掉入苦海深渊。

实行土地奉上

1939年7月，在新京（长春）国务总理张景惠官邸，召开了18名蒙古王公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强制土地奉上，废除王公世袭制度，土地特权收归国有。喀喇沁右旗的王公蒙租地在老哈河岸的建平县。为了便利整理蒙租地，遂将建平县合并于喀喇沁右旗。同时，改组了旗行政机构。旗长笃多博调任热河省公署参事官。陈子善、张林阁调至省公署。任杨子森为旗长，参泽勉为参事官，田中一郎为总务科长，坂户为警务科长。旗公署添设地政局、劳动科、蒙民裕生会。会后，地政局在全旗展开土地申告，蒙租和解，没有吃租蒙人的文契，汉人单独申告无效。白楂地汉人只有耕种权，没有土地永佃权。汉人租种蒙

租地出25倍的租款，蒙人所得租款完全存入裕生会，只得微少利息。因此蒙汉双方都受很大损失。有蒙人陈柱亭投机代替蒙人出卖地权，代出红契，从中渔利。地政局人员下乡，受贿行贿，给汉民加重负担。叶柏寿地政局办事处声称失火，将二年多的申告书、和解书一切手续，一火焚之，给蒙汉人民造成极大损失。这时，旗公署迁至平庄（原是一个小村庄，叫李连窝铺），当时设计规模很大，分行政区、工业区、商业区、文化区。旗公署机关都移至平庄，有满洲银行支行、平庄税捐局、邮电局、协和会本部等，赤峰黑水商人也来平庄开市营业。日商开设了日满旅馆、日满饭店。这里骤然成了繁荣城市。平庄地势平坦，叶赤铁路经过此地，交通方便。还修筑了大飞机场、飞机库，能降落200架飞机。并作为日伪在热河省北部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成立协和会

协和会是伪满行政、财务、司法等机关以外的一个单独组织，目的是为日本的所谓“德政”服务，宣扬日满亲善，日满协和，一德一心，宣德达情。推动各项侵略政策的实现。它的组织自上而下，有中央本部、县旗本部、村分会。除地方上的村分会，以上各部长都由日本人担任。各省、县、旗的省长、县旗长任名誉本部长，实际还是日本人说了算。发展会员时，不分民族，不论职业，只要服从协和纲领，加强亲日力量就可参加。

喀喇沁右旗起初没有旗本部，协和会本部在建平县，本部长为福田（日本人）。后来，派到喀旗一名日本人，名小野，来王爷府旗公署创办协和会。事务员吴希宪（王爷府人）到各村宣传，吸收会员，以村为单位成立协和会分会，村长兼任会长。

至1938年旗合并，旗本部迁至平庄，因为村长兼职，事务繁忙，另选有文化、有财产的人担任协和会长。凡伪满的节日或纪念日，协和会都要举办庆祝会。新兵入伍劳工赴工地也要举办欢送会。若施行新的政策，协和会要做宣传，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宣传工具。另外每年协和会召开一次旗联合会议。各地选出几名代表，将本村、本旗的要求、建议等作为提案，在会上讨论。不能解决的，提到省联、国联作最后的决定。其名义是上传下达，实际不论哪一级会议，都是按着日本人的指挥棒转，大家发言也不能持反对意见。

当时八路军在冀东搞游击战，热河西南地区的日寇受到沉重的打击。于是日本集中日满军警组成冀热讨伐队，对八路军进行征剿。同时利用协和会做反共宣传，协和会还将旗本部青年训练班的青年，组成武装协和青年队到前方搞反共宣传活动和情报工作。凡出荷粮谷、牛羊、劳工，协和会在最前列。省县一级的协和会权力很大，到基层就不行了，村公所警察见带协和会章的，骂是带“狗牌子”。老百姓对协和会的印象更不好。

采取各种手段，奴役残害人民

奴化教育

伪满洲国成立以后，在文化教育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如兴办了热河省承德国民高等学校、师范学校、女子国高等学校、凌源公营子弟正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并在喀喇沁旗王爷府新建国民高等学校，在原崇正学校的基础上，又增设国民优级学校、公爷府河南优级学校、平庄优级学校、乡村国民小学。伪满的教育，是奴化教育，以教授日语为主，给学生灌输日满亲善、尊敬日本天皇的思想。每校都有校训，大意都是日满不可

分离，一德一心等，师生到校要向日满国旗敬礼。高等学校用日语授课。把同化朝鲜的政策原封不动搬到满洲。如触犯校规即体罚、开除。提倡尊孔，每年春秋丁日祀礼。传授忠君爱国的封建思想。有一次，承德国民高等学校进行口试，教师问学生：你是什么人？学生回答：我是中国人。因没说是满洲国人，即说有反满思想，打骂后将那位学生开除学籍。还有一个中国教师讲历史，说原始类人猿是我们的祖先，就说这是共产党的教育，这位教师被处分革职。另外，每年在承德离宫进行一次教师训练，轮训各校在职教师，每期6个月。教师报到后，首先排队立正，听日本教官训话，然后按名检查行李。把分头剪成光头，把眼镜手表摘下，脱去破鞋，才分配到各宿舍。以后，每日检查一次宿舍，如行李放得不整齐、室内不清洁，即站队训斥，责罚记过。夜间点名，教官拿着手枪在教员头上敲打。有时紧急集合，一鸣口笛，马上集合，如领扣、皮带、裹脚装束不整齐，就挨打罚跪。每天轮班做饭，自己打柴，吃的是霉高粱米。还要二人一班做豆腐，挑到大街叫卖。日本人骂中国人有奴隶性，拿中国人不当人待，受一次训练，教员面容憔悴手破脚裂，如同经过一次地狱生活，痛苦难言。如公爷府教员乌云梯、吴英回来与人相告时抱头痛哭。

强效武器

民国时期，在热河地方，大地主，大商号每家都雇着打手（护院的），备有枪支。凡富裕户都买枪买马（称枪马户）。地方上组织人丁保甲队，街镇成立了商团，都有枪支。还有一些无业流氓和地主子弟，游手好闲，爱马玩枪。商号老板保镖也有枪。如通兴当的左翰章、拔贡地太恒栈赵国宗出门前后都有四个背盒枪的随从。有一次，公爷府的45名商人结伴赴赤峰，乘

马挎枪，简直像便衣队。所以，地方上枪支弹药很多。1933年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日寇怕人民起来反抗，所以发布命令，张贴布告要回收武器。禁令以后，再存武器，以通匪论处。一日，公爷府来了一辆汽车，下来1名日本军官、6名日本士兵，在二分驻所院内。军官用日语发命令，实弹守卫。门口1人，院内四隅4人，1人持枪在院内巡视，让民众来交武器。因事先早有通知，各甲商民携带枪支纷纷前来交枪。3天收回大小枪支两大车，土炮在当地毁为废铁。经过一次武器回收，全旗枪支完全收回，可日本人还不放心，命令治安队在喀喇沁全旗收缴枪支。治安队到处打骂，使用各种毒刑威逼人民。人民实在没法，用高价买枪、买子弹“赎罪”。一听说治安队来了，人们像避瘟神似地四出逃走。

以后，又令警察署，随时收缴枪支。警察借此为名，敲诈勒索。公爷府警察署署长郭子良一到任就来了一个下马威，向张宗英、姜益斋收枪，不缴就给他们灌冷水。最后张宗英用250元买了一支破斜匣枪，姜益斋交烟土20两、子弹50粒，才算完事。

1941年11月，热河警察厅笠警尉带了20名警察，乘大汽车来公爷府警察署缴枪。村长白袭铎见我说：“可了不得，日本警察署打人灌凉水呢，快去用‘协和会’的名义求求情吧。”我到警察署一看，院里跪着不少人，有甲长和一些大户，日本人正将本街商人石大头捆在板凳上。旁边放着一桶水，好几个警察拿水壶往人们衣领里倒。11月的天气特别冷，人们直打哆嗦。我向笠原求情，保三天交枪，才算把人放了。后来又将牛头沟门天主堂张神甫传来，不容分说，押在小监狱上刑。因警察署长没带刑具，笠原还把署长打了两个耳光。第二日，张神甫交了一支梭子枪才被释放。因此甲长、大户们出好枪的价钱，四处

买破枪、子弹，七拼八凑完成任务。这一次缴枪，公爷府受到很大损失。

强种鸦片

喀喇沁旗久惯贩运鸦片。流氓奸商不顾亡国，只顾发财，将鸦片运往天津、北平等地。有的是武装贩运。当地有鲍海、姚事彬等四五十人编为马队，全副武装，将鸦片运往河北省乐亭县，交与烟商于洛亭。于与日本浪人和军警有联系，在天津、北京销路很广。所以贩运一次鸦片非常得利。日本侵占热河后，不顾中国人的死活，强迫种植鸦片。1933年施以小惠，勘丈烟地，私贩私运缓和了一些。1936年，旗公署设烟政科，各关隘严格查禁，地方强迫种烟，以一村为单位，各甲发配任务。按照农民在春耕以前的申告由烟科或村发给种烟许可证，注明姓名、亩数、段落、产量。再按许可证勘查，不许超过，也不许减少。为了垄断鸦片，不准私人存留，成立鸦片专卖署——大满号，后改为鸦片组合，收购鸦片。到割浆时期，种烟户持种烟许可证到鸦片组合去卖，按烟土的稠稀合成算准两数，填写在种烟许可证上。价格分一、二、三等。缴烟土时查看种烟许可证，卖了几次，是否符合规定的产量，以及是否卖完，还欠多少等。鸦片组合舞弊弄虚，以假混真，压等级，加水分。将烟浆晒成烟砖要去水分，警察官、村吏等人，为贪占烟土，便压低等级，增加水分，这些损失，都加在种烟的老百姓身上。因此多数人交不上烟干，挨打挨骂。一年比一年逼得紧。为逼缴烟土，省县旗成立了缴土工作组，不少日本人参加缴土工作，分发到各村缴土。每到一甲，要给预备公馆，大吃二喝，召集种烟户，按名念种烟证，卖几次，多少两，有没有不欠烟干的，只许说有，不许说无。还放有各种刑具。只要烟册上有名，下年还得按亩

种烟。有一年中秋节，老乡都弄点吃喝准备过节，来了缴土工作组，老乡吓得大都跑了。没走脱的被集中到一起，对面站立，互相打嘴巴，然后向太阳跪着，两手高举一二个小时。后经甲长作保，答应缓期想办法交烟，才放走这些人。

日本人禁止私人贩运烟土，在火车上检查得更严。旅客上下站，不论男女，身上、行囊都受检查。有些烟商雇佣穷人用避孕保险套每个能装二两熟膏放在肛门内，带到目的地，有的保险套在腹内破裂把人毒死。

我在沈阳参观过一次鸦片制膏厂，地址在市东南关小河沿，面积很大，周围有武装人员守卫，车间有若干锅炉，由鸦片入锅到煮膏、过滤、成膏、切片，完全自动化。一日能出1万两烟膏。包装是手工。有七八百女工，俱是20岁以下的姑娘，着白衣白帽。包装的彩色纸盒，每一大盒20两，内有若干小盒。门口有武装门岗和女检查员。他们有打骂权，每当下班，检查甚严。制出来的烟膏有的出口，在各地设鸦片零卖所，发给吸食证，公开叫中国人吸食鸦片。

制定统制法

1938年日伪颁布各种统制法。包括小麦粉制统法，米谷管理法、劳动统制法及棉布麻、丝内油皮革等一系列的统制规定。以上物品皆规定为统制品，任何人不得私自买卖，查出来即为经济犯。各地商人把原存的货物藏起来。赤峰、公爷府的大小铺面都上门板，柜台上布满尘土，货橱内空空如也。有人乘机作投机生意，囤积居奇、哄抬高价，暗中出售。农村更为困难，东洋货也没了，一尺布、一盒火柴都买不着。小商倒闭，饭馆摘了幌子，买卖歇业，工人散伙，失业者千千万万。奸商与当地警察勾结，私买私卖，从中牟利。奉天（今沈阳）偌大城市，

全市没有肉菜面食。早市四点钟开市，有一些卖食品的或卖麻丝布、旧绸缎衣料的，也不断被警察打散。赤峰更困难，物品奇缺。有时老爷庙的小胡同，有妇女小孩提筐卖烧饼、香烟等，价格非常贵。一盒烟一元，一个烧饼五角。一见警察急忙逃走，一日不遇警察，是为好运。

由于棉布缺，将日本的破烂估衣片，运来分配给商店出售。农民只得穿日本估衣片，什么颜色的都有，真的成了“日满协和”。各城镇成立配给所，每次进货不多，由警察官、村吏员、伪职员配给，不知剥几层皮，剩下的才分配给农户。因此，物价暴涨，多数人维持不了衣食。从集市上看，人们衣服褴褛，面色憔悴。农民陈树庭，当时没有布做衣服穿，叫他的儿子小栓驮一点粮食到汤道河换布，鬼子捉住说是经济犯，打得昏过去好几回，又押起来。听说要判徒刑，陈树庭卖了一条大牛，将钱送给鬼子的狗腿子，才把小栓放回来。火车上检查得更严，发现私带棉布、粮食，就是经济犯，东西被没收，人被扣押。家无食粮，人无衣穿，农民喘不过一口气来，憔悴困顿，未有甚于斯时者也！

粮谷出荷

各种统制法施行以后，1941年伪又加紧收购粮食，叫粮谷出荷。以一村为单位，土地面积将粮食产量40%到50%分配到各村。规定价格很低，和白白没收差不多。喀喇沁右旗西部指定的收粮站为旺业甸、王爷府、公爷府、大新乡。秋收以后，村公所通知甲牌长根据土地台账，按花名通知数字，督促如期出荷，刻不容缓。小牛群至公爷府七八十里，大车小驮、人挑马载、披星戴月，络绎不绝，到指定粮站交粮。有的农民没口袋，用被子、门帘、褥子装粮食。有一家没有口袋有棺材装粮，牛

车拉着出荷，鬼子见了感觉新奇，哈哈大笑。粮站办事人员摆架子，他们按钟点上班，老乡排不上号，有的等一二天，人吃马喂，住店盘费，有时卖的粮钱不够来回的路费。检查员检验粮食时，一不顺眼，说不合格，扬在地上。过秤员更刻薄，不报斤数，随便报秤，老百姓问问数字，开口便骂，举手就打。公爷府粮站设在通兴当西院，因没有仓库，用大猪圈装粮，夹皮墙都装满粮食。出荷完了，没有人负责保管，风吹雨淋，冬天大墙外被麻雀吃下的糠皮有一尺多厚。

平庄没有粮库，用秫秸在野地里围墙，高粱、谷子、大豆在野地里堆着，糟塌得厉害。锦赤线各火车站，大部分是用秫秸席子围圈，粮食堆积如山，日寇视中国人的血汗不如粪土。出荷以后，大地主还能剩下些余粮，自给自足；中小地主除去捐税成了缺粮户；其他小耕家，交地主租子，再加上出荷粮，当时就没吃的。饥饿借贷，丰年也成了荒年。

有一年春节前，警察署召集公爷府村的中小地主（我也在内）在村公所开会，日本警尉丸旦说：公爷府村还欠出荷粮两万多斤，怎么办？小户已经没有粮食，连自己吃的也没有了。就得你们大家想办法。会长带头替老百姓交粮，大大的光荣。结果只好大家分摊。丸旦亲自出马，带着我和张翻译，以及警长、村长司国均，在除夕这一天，下乡督催。到了牛头沟门王瑞家，张翻译连打带骂，将小米和淘好的黄米都装上车，又看见两张羊皮也没收了。就这样连强迫带打骂，在除夕一天内完成了任务。

施行国共法

伪满洲国成立后，以日本关东军为主力，驻守各重点城市和边境地区。地方治安由警察维持。警察从初期的10万发展到

30万，从军队来看，当时伪满的绝大部分官兵，都是原东北军和收降的土匪，多数有吸鸦片的恶习。为了逐步实现军队正规化，实行募兵制度，精简了许多官兵，设立了伪满陆军军管区。兴安军由兴安军军管区（郑家屯）统一领导。并成立军官学校，有中央陆军训练处、长春军官学校、王爷庙兴安陆军军官学校。以培养军官，充实骨干。但募兵仍然不符合正规化的要求。募兵定额分配到各县旗，地方上富裕家庭的成年男子，都不愿当兵。为了避免服兵役，他们以雇佣代替募兵（用小米一石或现款），凡应募的俱是无业单身青年，或有鸦片嗜好者。

为了加强军队的正规化和军事训练，充实伪满军队，在1939年颁布了“国兵法”，凡年满20岁的男子，都服兵役，在全满广泛宣传推行。县旗加强兵役机构，村公所设兵役系，专办兵役事务。如登记国兵适龄册记，注明年龄、民族、家庭状况及财产等。每年一次国兵身体检查。有一年喀喇沁旗的国兵检查在王爷府崇正学校进行，由军管区来的检查官是日本上校，检查人员有宪兵、军医，将全旗的适龄青年召来，残废的、不能行走的也抬来受检查，恐怕冒名顶替。各村的村长、协和会长也参加。检查开始，五人一组进室，报告家庭历史、生活状况等，对照适龄登记卡片。然后将全身衣服脱去后由医务人员检查身高、体重、视力等，填写在适龄卡片上。最后由检查官决定合格与否。合格人即高呼合格。有的人在申告时，不从实报告，身体检查时，故意装聋，装眼力不好等；宪兵就带到另一室特别检查，还要打骂、罚站。有时大冬天裸体在室外站2小时。合格的国兵本地警察署、村公所负责保护，如故意损坏身体，署长、村长负责。

国兵入伍后，待遇很坏，吃高粱米饭，挨打挨骂。军事训练时，身负五六斤重的武器，上山下梁，一小时行军数十里，其

痛苦不堪言状。训练不合格的为“国兵漏”，入“勤劳奉仕”队到矿山、建筑桥梁、修公路，义务劳动3年。

劳工苦役

伪满洲国成立以后，修筑铁路、公路、开设厂矿、架电线。繁重的劳动，除本地百姓负担外，还得从外地雇佣固定劳力。如修锦承铁路、叶赤铁路时，从华北、河北募雇劳动力，到东北从事劳动。后来又开采热河煤，阜新煤矿，扩建抚顺、密山煤矿……劳动力很不足。1938年施行劳工法。县旗成立劳动科，村公所成立劳动股。在地方征集劳动力。名义是劝募，实际是强迫。有几种人可以免役，即官吏、职员、大地主等有财有势的人。穷苦百姓是劳役的对象。喀喇沁旗的劳工多数去密山、北票、阜新采煤。村长和甲长一商量，指名去当劳工。开始还给几斗米，后来米也没了。警察协同捉劳工，百姓哭叫连天，妻离子散。矿山待遇非常不好，每日做12小时工，把头经常打骂工人。日本人下井监工更是厉害，用刀背砍，用大马靴踢。就这样，每日只发给工人5角钱的工资，就连霉高粱米饭都吃不饱，矿内设备不安全，时常发生伤亡事故。密山是水草湿地，工人宿舍简陋，不讲卫生，经常得传染病，又没有医疗设备，每天都有死亡。公爷府村的大老盖，就是当劳工死在密山，没有一点抚恤金，尸体也没弄回来。一年征好几次劳工。公爷府村一次就征去20余人，家里的人无人抚养，受冻挨饿。以后征劳工的人数逐渐增多，平庄修飞机场就征来千数人服劳役。

集家并村

自1940年，八路军在冀东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后，他们万分惊惶，调集大批伪军、警察组织讨伐队，进行了几次讨伐和

扫荡，但都归失败。八路军的游击队，发展到热河省的滦平、丰宁、大阁等地，袭击了小寺沟车站，活捉了两名搞反共宣传的道德会女宣传员。抗日势力逐步发展到平泉、隆化等地，日寇采取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实行集家并村。分散的农户，集中到一个较大的村庄破坏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他们镇压人民，封锁物资，围困解放区。

1940年到1941年，由日本人和警察组成集家工作队，进行集家并村。在据点修筑部落，部落外一户也不留，房屋拆掉，如到期不拆，有镐头队去拆，有的用火烧。凌源许春璞一家被火烧死6口人，强迫迁入规定部落里。迁居后，贫困户盖不起房子搭个窝棚。东西没处放，堆在外边，再遇夏雨连绵，室内外一起挨雨淋。没有柴，只好烧柜箱等木器。人多房小，拥挤不堪，牲畜猪鸡与人同宿，遍地粪尿，臭气冲天，瘟疫流行，老年人和小孩死亡很多。田地荒芜，生活困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部落里有保长，居民白天出去种地，晚上必须回来。出入登记，谁家来人向保长报告。

锦承线上，一过平泉，铁路两旁居民的房屋拆得乱七八糟，东西到处乱扔。菜园、果园都成野地，满目凄凉。1943年，喀喇沁右旗实行集家并村，由旺业甸、安丹沟、白石台沟拆房子，修部落。白石沟70多户人家，房子拆得一间也没剩。在旺业甸一带制造无人区，不准到茅荆坝骆驼山子耕地采伐。如果没有证明书进入无人区，开枪打死勿论。在集家并村四年当中，喀喇沁右旗烧房屋15万多间；荒废耕地180万亩。损失大小牲畜1万多头。死亡人口4500人，被捕送往东北做苦工的8000余人（以上见《热河群众日报》）。除此以外还施行保甲连坐，加强特务训练，扩充伪军据点，要老百姓看路，当炮灰，当“肉电杆”。日本人凶惨到了极点。

日寇的魔爪——宪兵队

宪兵是一种特种兵。伪满时期，宪兵是日本人用来镇压反满抗日人士的工具。当时各重要城市都驻有日本宪兵，铁路沿线也有满州国宪兵，他们同样欺压百姓。赤峰有日本宪兵处，很多无辜百姓被他们抓起来审讯，所用的刑法很残暴。有子弹头刮肋条、灌辣椒水、灌火油、蹲水牢等，不知多少人死在宪兵手里。有一次我看见二十几人被宪兵用麻袋把头装上，五花大绑，用汽车载着往赤峰宪兵处解送。在赤峰火车站，每次旅客出站时，数十名日本宪兵，面貌狰狞，怒目而视，见有可疑的旅客，就停止放行。每次都有十几人被检查，挨打或逮捕。山海关、古北口为“国境”，检查得更严，旅客每次都列成长队，将行李、背囊打开等候检查。日本宪兵和伪特故意刁难。去北平更困难，得有本地警察署的出国证，还要回宪兵队、警察局等各关卡登记、挂号、印指纹二三十次。每人只许带伪币50元，多则没收。东北和华北本是邻省，可划成“两国”。中国人在本国旅行也受限制。

公爷府驻过一次日本宪兵，队长叫鸠山。在本街招收了二名特务，搞各机关、乡村及商民的情报。这二人狐假虎威，依势压人，敲诈勒索。鸠山化装成便衣，经常带着他们二人夜间串山沟。有一次晚上到了小柳条沟，老乡王生刨茬子，他们说给八路军放哨，便吊打灌凉水，经村民作保才释放。此外，还驻过一次伪满宪兵队，宪兵处设在商号利汇川门房，队长巴特扎布（蒙古族）带四名班长。各甲派四人值日，给他们供应蔬菜、鸡蛋、劈柴。商人给准备绸缎被褥、化学麻将牌、留声戏匣。他们喝醉酒就打人。特务比宪兵还可恶。公爷府警察署的特务马之禄、郝玉宗化装便衣，暗带手枪、捕绳，到处敲诈，随

便捕人。警务科的特务吴树栋（小庙子人）到处讹诈勒索。公爷府全村都受过他的害，特别是史东江被他害得家破人亡。八路军工作队的李荣春以前就和史东江有来往。1944年，李荣春带领十几人来史东江家住，一日夜晚去小庙子捉特务吴树林时，两边开火，打死了吴树林的老婆，关其祥同志负了伤。抬至史东江家，连夜又送至柳条沟史东坡家。吴树林逃至平庄，向警务科报告，5月来了三十几人的讨伐队，队长李久荣，他们到嘎叭河，捉住史东江和王羊信（王子良），要就地枪决，村里人磕头求情，才把王羊信放开，将史东江带至平庄。坂户警务科长亲自审讯，史东江受尽酷刑。7月，史东江的二哥史东壁去平庄探听消息，刚下火车遇见吴树林，也被逮捕，送至警务科，经过几次审讯，在水牢里押了两个多月，最后被装在皮口袋里摔死。史东江被送至锦州法院，解放后才回来。

灾难深重的热南人民

日寇临近末日，更加疯狂。为了防备八路军游击队，日寇拼命推行它的囚笼政策，抓劳工、派民伕，在主要铁路两侧普遍修护路井、封锁墙，加铁丝网，但是敌人白天修，八路军晚上破坏，敌人束手无策。由日军宪兵配合警察清乡，每到一村把全村的男女老少赶到一起，四面包围，架设机枪。男的站在一边，女的站在一边，叫小孩认他们的亲人，剩下的就说八路，赶到集中营，严刑逼问，甚至枪决。还用柳条串腿，十数人一串，牵着走。

承德南有万人坑，常以通八路军为名，将成百的无辜百姓用机枪扫射，扔到坑里。

“八·一五”光复后日本鬼子的下场

1945年苏联红军占领柏林以后，给日本帝国主义敲响了丧钟。日寇不甘心失败，还要作垂死挣扎。他们一方面组织航空敢死队与美国交战；另一方面为了死守满洲，那时里修机场、挖山洞、筑工事。在喀喇沁旗，占用好地，割青苗，每天都有几百辆大车，几千名劳工在那时穿梭不息，给日本人服劳役。

1945年5月，热河省召开了一次有各地代表参加的会议。会上，省次长和铃木警务厅长讲了话，他们色厉内荏地说什么：西欧战争刚刚结束，苏联无暇出兵。日苏订有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决不能帮英美打仗。还吹嘘皇军天下无敌，最后的胜利属于皇军等等。

当时的喀喇沁旗，还在受日寇的横征暴敛，百姓仍受日本人的打骂。8月15日，传出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这时候，伪旗公署赶忙将原来的牌子摘掉，警察、职员都把黄衣脱下。伪旗公署的日本参事官五十岚、警务科长田中等十数人见势不好，携带武器骑马逃跑，沿路抢吃抢住，经西桥坤兑苏到叶柏寿后，声称是喀旗参事官，要求收容，当时，伪满军也到处哗变。

警察、汉奸、特务旧日的威风一扫而光。人民喜气洋洋，奔走相告，十几年的非人生活终于熬出了头。各种食物和日用品自由买卖，“违禁”物品也都在市场上出现了，街上呈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景象。

中国人民经过十几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逞凶多年的日本帝国主义犹如丧家之犬，逃之夭夭。但是他们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是不会忘记的！

伸向葛根庙的魔爪

舍旺

清朝嘉庆元年（1796年），原哲里木盟10个旗王公在扎萨克图旗境内兴建一座西藏式造型的大寺庙，命名陶赖图葛根庙。

该庙以梵通寺、广觉寺、宏济寺等5大殿堂为主体，以各大小宫殿和教徒住宅等组成，总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这个庙喇嘛人数最多时近1 000人。以释迦牟尼、宗哈布、麦德尔为主供佛像；以甘珠尔、丹珠尔等为主诵经卷；并设有哲学系、理论系、医学系等四大学塾。

伪满康德2年（1935年）春，日本侵略者为了全面强化统治，派遣“日本喇嘛”加藤进驻葛根庙。加藤化法号为：敖木普尔爬克瓦，自称“达喇嘛”。他窜入葛根庙后大肆宣扬他是“日本帝国佛教界忠实信徒，为了加深研究经典、详尽考察佛教历史，以求深造而到葛根庙。愿与众教徒同甘共苦，为普渡众生而献身……”

加藤在葛根庙长期居住，该庙葛根活佛和所有权威喇嘛对加藤均感厌恶。但在日本侵略者横行时期，只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不敢公开表示反感。

加藤进葛根庙后，从不参加该庙的一切日常宗教活动，却拼命把持行政教务大权。在此基础上，以扩大庙仓经营和改善生产管理为名，从伪满康德3年开始，以庙仓名义，招雇蒙古36人，在该庙仓原经营的97亩地的基础上大量开垦荒地。6年内，加藤以个人名义占有土地达19 500余亩。全部收入，完全由加

藤一个人掌管和支配。葛根庙仓无权过问。

伪满康德8年(1941年)，伪满洲国政府发布了《整顿喇嘛教法案》。继之，各地的日本特务机关，以“重视宗教信仰”为名，向各蒙旗大型寺庙开始派遣特务。他们均以“日本佛教徒”的伪装身份，窜入各庙活动。

被派进葛根庙的日本喇嘛崛内，年龄近40岁，法号为“巴达玛道尔吉”，他略通蒙语。崛内虽然也在葛根庙安家落户，但很少在此居住。经常频繁往来于王爷庙(乌兰浩特)、新京(长春)、贝子庙(锡林浩特)等地。崛内与当时在新京(长春)的蒙古实务学院的佐藤富江和伪满王爷庙日本特务机关的麻生达男等人的关系密切，经常互相来往。

1943年崛内提出，在葛根庙办一所“国民义塾”，企图招收一批小喇嘛为徒。使小喇嘛学会日本话、会念日本佛经，以培植更多的走卒。对此葛根庙权威喇嘛们感到震惊，因事关重要不宜轻易表态，请示小葛根活佛后，以“小喇嘛入学，会影响学习藏经、分散精力……”为由，对崛内的行为表示了反对。小喇嘛们也纷纷表示不愿参加此事才告终。

崛内不经常出席参加社会活动，多由精通蒙语的“伙伴”麻生达男代替。麻生在长期活动中，经物色和培养，把葛根庙半路出家的喇嘛扎木沙招收为徒。从此，扎木沙不受本庙戒律约束。经常到王爷庙街，出入日本特务机关。葛根庙喇嘛们讽刺其为“吃辣椒的害虫，是从辣椒里生长出来的。”后来扎木沙不得不离开了该庙(据说逃到锡林郭勒盟被捕法办)。

日本特务崛内、麻生等人，为加紧培植亲日分子，又提出要从葛根庙小喇嘛中，选若干名派往日本参观学习。该庙权威喇嘛以“葛根(活佛)不同意，小喇嘛们不愿意去……”为由，与崛内多次争辩。崛内实感众怒难犯，终于停止了选派。最后，

他们从乌兰哈达平民青年中，选派色音乌力吉等人以庙奴子弟为名，送往日本参观学习。

1945年夏，幌内急急忙忙赶到葛根庙，与加藤合谋将该庙在石灰场附近的良田六方半（每一方为45垧）偷偷卖给了洮南城里的一名朝鲜人。将卖地巨款，全部揣入私囊，乘火车跑了。

当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宣告无条件投降，麻生达男也随加藤一起向长春方向狼狈逃窜。

（摘自《哲里木文史资料》）

回族四青年 逃出“虎口”的经历

王德年 口述
张彻 整理

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正忙于太平洋战争。为了筹集战争物资，需要大批劳动力，特颁布了一系列“全民皆劳”的法令。伪满的日伪统治者除了颁布“勤劳奉仕法”外，并开始大规模地“派劳工”、“抓劳工”。强制中国人民到矿山去挖煤、到边境去修“军用国道”（国防公路），到深山去建筑军用设施。同时对验“国兵”不合格的青年（当时俗称“国兵漏”）实行强制无偿劳动，每年出劳工6个月，一连二年，以后因劳力不足就无限期延期了。这些出劳工的人组成“勤劳奉仕队”，他们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干活，受着非人的待遇，许多人死在劳动现场。

1943年春，我和狄世品、杨万铭、金永贵、韩宝林、杨福泰、韩来俊、韩来金、马连山等60余名验“国兵”没合格的吉

林回族青年，被强制带到黑龙江省鸡宁县丛家店去修建“军用公路”。到达“工地”后，把回族青年编为一个小队。

3月的黑龙江省，天寒地冻，冰天雪地。我们住的是破漏的席棚子、吃的是发了霉的苞米面、高粱米，还不给吃饱。在日本关东军的刺刀监视下，干的是重活、苦活、累活。一天要干十三四个小时，不分体力强弱都得一个样干，有病也不能休息，不然就棍棒相加。并规定离开工地不准超过400米，违者抓回来必遭痛打，甚至打死。平时遭受打骂司空见惯。

为防止劳工逃跑，在我们由家出发前，就把每个人的“国民手帐”（居民身份证件）收缴上去藏起。当时在边境地区无“国民手帐”则寸步难行。

到鸡宁后，发给我们每人一双水袜子（胶鞋），但不让穿。马连山脚冻坏了，偷偷穿上，于是被打得遍体鳞伤，差点被打死。

一到“工地”一个多月就有人死去。我们这些回族青年不甘心忍受折磨，大家都想伺机起来反抗。我和狄世品、杨万铭、金永贵四个人就暗中合计，决心想办法逃出火坑。于是我们就用“倒脑”（回族中流行的唱诉苦歌）的形式，控诉日伪的暴行，并串连伙伴们赶快逃走免得都被折磨死。我们还动员小队长韩某某，请他带领全小队逃走，给日伪统治者一个打击。但韩某某态度非常暧昧，原同意一同走，后来又“变卦”了，不但不走，还要去报告“请功”。

我们四个人商量了逃跑计划：一要选择日本军监视放松的时候；二要想办法把“国民手帐”偷到手。后来我们发现监视我们的日本关东军士兵，常常在饭后余暇时间进行摔跤游戏。我们想到：回族队员中不少是摔跤能手，何不进行一次摔跤比赛，利用比赛时机，既可把“国民手帐”偷出来，又可缓松一下日

军的监视。

于是我们找队中粗通日语的人和日军联系，要求和他们进行摔跤比赛。日本士兵不断练习摔跤，觉得有能力摔倒几个中国人取取乐，还可显示一下“皇军”的威风，就答应了，并约定午后早点收工来比赛。

就在比赛的前一天，我们这些身受日本鬼子欺凌的人，想到逃跑在即，大家非常高兴，于是就打了一个监工的日本士兵。

那个日本兵外号叫“小耳朵”，平时打人非常凶狠。那天我远离住处到东山上去砍树，小耳朵又用木棍殴打队员，我们急眼了，上去几个人，狠狠地把他打倒在地。小耳朵当时求饶了。实际他是想回去报告中队长后，再惩治我们。但那天正准备摔跤比赛，日本军官就想把此事放到比赛以后去处理。

比赛开始前，我们请求队长令全队人员都来参观比赛，帐篷不用留人看守。比赛开始后我带领几个摔跤能手下场，同时暗叫杨万铭、狄世品二人趁机潜进帐篷内去偷“国民手帐”。我和金永贵使出多年练成的招数，一连把日本士兵摔倒了几个，日本军官气得瞪大了两只眼睛，气势汹汹地也下了场。这时杨万铭、狄世品二人已把“国民手帐”偷到了手，来到比赛场向我打了个暗号。我看事已得手，就给金永贵使了一个眼色，比赛中坚持几下就故意输了。日本兵“得了胜”，个个喜上眉梢、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当天晚上我们四个人一宿没睡，熬到天亮，借到河沟洗脸的机会迅速跑向山里去。3月的北方，树叶还没长出来，光秃秃的树林不易藏身。于是我们就隐藏在事先合计好的离工地不远的山坡上的深沟内。这样可以迷惑日本鬼子，料想不到我们竟会藏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不多时，日军发现我们逃跑了，就分两路顺着大道向东西方向追去。日军的马蹄声、摩托声、吆喝

声听得真真切切。我们四个人趴在沟内一动不敢动，一直挺到晚上，趁着“月黑头”，悄悄爬出山沟，向密林深处走去。我们绕开大道，在深山密林中走了七天七夜，到了勃利县境。

第七天夜晚，离勃利县城约二十几里地方，夜色漆黑，连眼前几米远的东西也看不清。我们走着走着碰到一道铁丝网，就钻了进去。走了几十米，看见前面一片房舍，房舍前面大门处有日军士兵站岗。原来这是日军的一处后勤机关——酒保。我们又悄悄地退了回来。滚爬出了铁丝网，并迅速绕道离开了该处，每个人都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我们走到县城镇外一片荒郊地带，个个感到又冷、又困、又乏。正好碰到一处凹坑，我们就躲进坑内呼呼地睡了起来。天刚蒙蒙亮，大家醒来一看，原来周围是一片坟地，我们是睡在已经塌陷的坟坑内。由于连日在山林中奔波，浑身沾满了灰土，满脸泥垢。这时一辆牛车经过坟地，赶车的是个老头儿，车上坐着个姑娘。我们起来走向车前，想问问城内的情况。车老板一看，由坟墓内钻出几个满脸泥垢的人。害怕是强盗，是“鬼”，吓得打起牛就跑了起来。我们一边追赶，一边大声喊：“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想打听一下进城的道，你不要害怕。”老头一听我们说话和气，不像坏人，便迟疑地慢了下来。我们四人走近车前，说明是逃出来的劳工，问能否进入城内，有否回族人家。这时吓得蒙被躺在车内的姑娘也坐了起来。老头告诉我们：城里正抓剃了光头的逃跑的“国兵漏”，先别进城。城西门外有个回族马家饭馆，可先到那里去打听打听。我们谢过老头以后，趁天没大亮，赶到了马家饭馆。正巧掌柜的（经理）是吉林市老乡，又是我小学同学名叫内玉田。熟人面见，倍感亲近。我们在他家住了一宿。第二天内玉田给我们换上了本街老百姓衣服，胸前钉上名签，上面写上姓名、保甲号数（假

号）。没名签就有被抓去的危险。我试探着去火车站买火车票。到车站一看，尽是便衣特务在站内外巡查。我没敢买票，于是我领一人，金永贵领一人，由车站东西两头的铁丝网子钻了进去，把衣服还给了内玉田，然后混到了火车附近。这时一些日本兵正向火车上搬运咸鱼、罐头等箱子，有个日军“曹长”（准尉）正指挥装车。我们四个人赶忙由兜内掏出有“勤劳奉仕队”帽徽的“战斗帽”戴上（战斗帽是日军经常戴的便军帽，伪满后期连学生，奉仕队等也强制戴上此帽）。用很不熟练的日语向日本军官说明愿意帮他们装车。日本军官一看我们是“勤劳奉仕队”的，正感到装车人员不足，就毫不怀疑地叫我们帮助装车。干活中一打听，是运往牡丹江的。我们连忙说也是去牡丹江，愿意到牡丹江后还帮他们卸车。装完车后，日本军官允许我们上车，并给了一些吃的。这样，我们乘火车到了牡丹江，一路上避免了种种检查。到达牡丹江，找到了在回民饭店工作的吉林老乡杨占林，由他介绍在那住了一宿，第二天乘火车到了哈尔滨，我们四人就分手了，有的去外地，有的在哈尔滨投亲靠友，都没敢回吉林市。

我们四人逃跑后，吉林家中，我的父亲和狄世品的父亲及杨万铭的哥哥都被抓去当了劳工。

我在哈尔滨亲戚家呆了半年多，于1944年春天才回到吉林市。这时狄世品也回来了，但我们二人都不敢露面。到了11月份，认为没什么事了，才敢露面。不料日伪官员仍不放过我们，又立即把我俩抓了去。当年12月转送法院判了刑。当时由于监狱的恶劣条件，又遭受残酷的折磨，不久，狄世品就病死在狱中。我也病重。碰巧，有个熟人尹绍增，他因“经济犯”服刑，在狱中做杂役劳动，他有机会到囚室的走廊去。我哥哥就买些药通过尹绍增送给我。这样，我才算活了过来。1945年东北光

复后，我得以出狱。金永贵、杨万铭到这时才敢出来。吉林市解放后，原小队长韩某某被人民政府判了刑。这是他罪有应得。

（摘自《哈尔滨文史资料》）

日伪当局在长白县 对朝鲜族的殖民教育概述

李权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朝鲜族聚居的村庄，设单一的朝鲜小学，与汉族杂居的地方，汉朝合校。据《长白县在籍朝鲜人生徒数目调查表》（伪康德4年11月6日）统计：长白县城新兴街（现绿江街）有“长白普通学校”，六年制小学学生，男337人，女78人，系朝鲜人民会主办。官房子有“宗山学校”六年制小学，三个班，学生，男97人，女20人，系金鼎宝主办。二道岗村有“东明学校”，六年制小学，二个班，学生，男70人，女23人。除此之外，再无单一的朝鲜小学记载。其余地方皆与汉族合校。

伪满时期，长白县始终没有单一的朝鲜族中学。全县唯一的一所中学系汉朝合校。这所中学最初叫“县立初级中学”，后相继改为“县立农林学校”、“省立农业学校”，“省立国民高等学校”，一直都是汉朝合校。据上述《调查表》统计：伪康德4年，县立初级中学共三个班，学生仅91人，其中朝鲜族学生34人。可见，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汉朝民族能上小学的已为数不多，能读中学的更是寥寥无几。

1937年（伪康德4年）10月10日，伪民生部下令，两级小

学改为“国民小学”（四年）和“国民优级学校”（六年）；农村小村屯设“国民学舍”（三年）和“国民义塾”（二年）。同年“归屯”以后，为加紧灌输奴化思想，各村屯普遍设立小学。据《儿童就学状况调查表》（伪康德6年6月22日）统计：伪康德4年到6年，全县单一朝鲜族小学4所，12个班，教师13名，学生1774人，加上汉人学校的朝鲜族班，全县朝鲜人学生共2175人。入学率达到93%。这是日伪时期朝鲜小学入学率最高的年份。当时，学校必须按“教则”进行教学。例如国民优级学校教则第一条规定：“国民道德之涵养于国民教育最为重要，任何学科目均依建国精神及访日回銮训民诏书之趣旨，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阐明忠孝之大义并涵养仁爱之至情及民族协和之美风，促其为国家社会效劳之信念，并依劳作养成爱好勤劳，尊重职业实践躬行之精神，以期国民道德之彻底。”为了强化亲日教育，地理、历史课被取消了，加强了日语课教学。课程如下

| 学 时 数 年 | 学科科目 | | 国民科 | 算术 | 作业 | 图画 | 体操 | 音乐 | 计 |
|------------------|------|----|-----|----|----|----|----|----|---|
| | 满语 | 日语 | | | | | | | |
| 一 年 | 7 | 6 | 6 | 1 | | 3 | 3 | 26 | |
| 二 年 | 8 | 6 | 6 | 2 | | 3 | 3 | 28 | |
| 三 年 | 8 | 7 | 6 | 3 | | 3 | 3 | 30 | |
| 四 年 | 8 | 8 | 6 | 3 | | 3 | 3 | 32 | |
| 五 年 | 8 | 8 | 6 | 6 | 2 | 2 | 1 | 33 | |
| 六 年 | 8 | 8 | 6 | 6 | 2 | 2 | 1 | 33 | |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殖民地统治，还强令学校每天举行朝会，遥拜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读“国民训”；中午默祷；每月参拜一次神社等等。

从1939年（伪康德6年）开始，日伪当局又强行“日本皇国臣民化”，逼迫朝鲜族将自己本民族的姓名改换成日本姓名，一律使用日本语言文字，妄图把朝鲜族同化为大和民族。学校取消了朝文课，所有教科书都是用日文，学生再若说朝语写朝文就要受到严厉惩罚。从此之后，苦难的朝鲜民族被逼上“亡国灭种”的绝境，自然，朝鲜族教育也就彻底被取消了。直到1945年祖国光复。

（摘自《浑江文史资料》第六辑）

日伪对讷河少数民族的奴化教育

白宗林

日本侵略者踏进讷河大地就施展“以华治华”的卑鄙伎俩，制造民族矛盾，又拉又打，妄图达到分而治之的罪恶目的。举办教育也把民族划成等级，根据不同民族的不同等级，施以不同程度的教育，日伪当局视大和民族为“高尚的民族”是国民的主体。日本人在教育上享有特权。1941年后，在国民高等学校中也推行“日满共学制”。战犯星野直树对推行这一学制解释说：“仍然在设立前述之前国民高等学校时，仍然要采取日满共学制，以日本人为中心，招收英俊的满人，来培养优秀的中坚分子……现在满洲的教育重心，就是整个日本的教育重心……”这就是说，伪满的学校并不是专为伪东北青少年办的，而是要逐步为日本人所取代。在讷河县日本人享受最高的教育权利，普及八年制教育，相当于初中。自1938年日本开拓团侵入县境后，陆续在北学田、下学田、上学田、三头南会津等开拓

团团部驻地设置了八年一贯制的学校。一至六年为初等班，相当于国民优级，七至八年为高等科班，相当于初中。1943年，日本军、政、警、宪、特子女日益增多，在县城西门外（今四中校园）建立日本八年制学校一所。所有的日本儿童全部从一年级一直念到八年级，毕业后送到新京（长春）及东北各地高等学校深造，培养中、高级统治者。日本校舍全是砖瓦化，天棚地板，并设置洗澡间，文娱和体育设备齐全，学生上学享受津贴，操衣（校服）、书包统一免费发放，样式一致，配给的粮食100%的细粮。对学生的法西斯训练很严格，每年不到9月30日不准脱夏装，女学生穿裙子秋季两腿冻得通红也不准说冷。体育课两个学生摔跤，被摔倒的一方身上摔疼了、摔破了不准哭叫，往往还要受到斥责，胜利者一方要受褒奖。

朝鲜族是日本侵略者重点拉拢的对象，被视为国民的支柱。对朝鲜族多施用“怀柔”政策，给以小恩小惠，让其子女享受仅次于日本子女的优厚的教育权利。普及六年教育，即国民优级（初等）教育。在县城东北二道街路北建立一所名为鸡林国民学校，以后置高小班，称鸡林国民优级学校，同鸡林国民学校是一所学校挂两个牌子，专门招收朝鲜族学生。全县朝鲜族学生都到这所学校就学，高小普及率达100%。校舍砖房草盖，文体设备基本没有。教育经费较汉族学校多，1942年汉族学校全年平均每个学生15.7元，朝鲜族学校全年平均每个学生108元。住宿生配给70%细粮，大米里边掺黄豆煮饭。学生念书无津贴，一切费用自理，教材全用日语编写。学生除一年级刚上学时允许学半年朝鲜语之外，以后全学日语，在校内不准说朝鲜话。每星期一发给学生10张票，说一次朝鲜族话往学校交1张票，星期六学校检查，剩票多的要受到表扬，剩票少的要受训斥，剩票最少的要用竹棍打腿。伪县公署公开宣称鸡林学校

优级毕业生可以考西门外的日本学校的七年级。几年来只有一名学生上了这所学校，学校当局还以有沙眼病为由把这位学生拒之校门外。

对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因其朴实勇敢，日伪当局尽量笼络，办学校汉族优先。首先在达斡尔族讨伐队官兵家属居住的霍旗屯建立了学校，以示关怀。以后相继在达斡尔族人口较多的倭都台、伯乐科等屯落建立了学校。对鄂温克族聚居的占音屯学校，因有位伪军团长（鄂温克族）家住在此屯，办学投资较大。但这些民族没有文字，使用汉族学校教材，住在边远山区的学生只得远离家门到汉族学校就读，在经济和教育手段上均无特殊照顾。由于生活困难和语言不通，除少数官绅富户把子女陆续送到布西（莫力达瓦旗）、齐齐哈尔、扎兰屯等地民族学校就读外，其余适龄儿童绝大多数失学或中途辍学。普及率不到10%。

汉族被日本侵略者视为最危险的民族，受到严密的监视和控制，教育投资小，层层截留，只在原有学校增加班级，很少新建校舍。学校网点过稀，校舍除城镇有少许砖房外，其余全是土房。1942年全县有较大的屯落610个，而学校只有100所，平均6.1个屯有一所学校。设备极其简陋，乡村学校除一架挂钟，一个手摇铃外，再无其它产业。乐器和体育器材一概全无。学生发放操衣收全费，但同广大群众的衣服比较，布料较好，价格便宜。从县到村层层克扣，落实到乡村学校一个班级二三十名学生只能摊一两件，由学生抓阄。1943年后，乡村学生除了讲授“建国精神”和日语外，其它知识学得很少，每周劳动二三天，学生认识庄稼二字都很困难。主要为日本侵略者训练劳工、苦力和扩大侵略战争的炮灰。当时，老百姓衣食难保，无力让学生远离家门念书。适龄儿童35 399名，入学12 958名

(包括中途辍学的)，入学率只达36%，比民国20年还低7%。

(摘自《讷河文史资料》)

伪满龙江县卧牛吐达斡尔族生活概况

〔达斡尔族〕 乌力斯·卫戎^①

祖国北疆黑龙江省龙江县境内居住着15 000余达斡尔族人民。龙江县卧牛吐区(第九区)，是齐齐哈尔达斡尔族的主要聚居区。

卧牛吐〔达斡尔语为斡诺尔吐(WONERT)〕是大约在1649年至1651年(清顺治六年至九年)，达斡尔族由黑龙江上游大批向南迁徙到嫩江流域时，由库尔堪莫昆、乌力斯哈拉(姓氏)的人们建立的村落。斡诺尔吐，位于齐齐哈尔市东北22.5公里，是紧靠嫩江岸的村屯。“斡诺”，达语是小沟壑的意思，此地建屯时座落东西两个小部落，两屯之间有一条好似地裂的道痕构成小沟壑，由此取屯名斡诺尔吐。

卧牛吐区，在清朝时期，归清政府设在齐齐哈尔屯的齐齐哈尔达斡尔总管府衙门管辖。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编入八旗后，归所在佐领(官职相当于乡长)管理。旧中国时期，归龙江县卧牛龙乡管辖。伪满洲国时期，归龙江县达呼店村公所管辖，其户籍事宜，由卧龙吐警察分驻所管理。1945年8月15日祖国东北光复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建立了龙江县卧牛吐区人民政府。

① 乌力斯·卫戎，汉名吴维荣，现任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政协副主席。

在旧中国军阀混战时期，达斡尔族人向统治者的军阀政府纳军粮、献牛马，官员们听达斡尔族人讲本民族语言，他们则训斥说，不要讲你们那个牲口话。在伪满洲国，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在汉满蒙回藏五族协和的骗人招牌下，达斡尔族更失去了生存的权利。伪满大同元年国势调查（户籍调查）填报民族成份时，官员们拒绝说，“什么达胡里，满洲国没有这个民族”公开剥夺了少数民族的权利，无可奈何，达斡尔人只得申报“蒙系人”或“蒙旗人”，依附在蒙古民族名称之下，借异民族的名义才求得了生存。在此情况下，蒙古民族的个别人还凌辱达斡尔人是“九·一八蒙古”，意思是说“九·一八”满洲事变后降服的达呼尔蒙古。但是，广大的达斡尔族人民，尤其是达斡尔族的知识分子，为了民族的尊严，求得民族名称的恢复，争取民族的真正平等，他们连作梦都在想，达斡尔族终有一天能以单一民族的成份出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行列里。

达斡尔族贫富悬殊，阶级分化明显的变化是从清朝末期及旧中国开始的。从前土地是公有的，谁种都可以，那时操心耕种的人很少。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多年间，达斡尔族隶属清朝，编入八旗，男人们服兵役领俸饷，没有为生活担忧发愁的。家里人几家合伙种少部分地，够自己食用消费即可。所以用土地进行剥削的情况很少。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把黑龙江封禁的土地实行了开放，并从关内迁来大批移民，让其承领土地，特别是从民国3年（公元1914年）实行土地发照，确定地权后，少数人抢占了大片土地成了地主、富农，而无地少地的贫农、雇农就出卖劳动力当长工了。1952年据卧牛吐区634户达斡尔族的调查，其阶级变化情况是：在伪满洲国贫农283户，占44.6%；雇农207户，占32.6%；中农106户，占16.7%；富农21户，占3.3%；地主17户，占2.6%。现在这634户中，已有464户过着

中农生活，占 79.2%；贫家农 156 户，占 24.6%；雇农 14 户，占 2.2%。从牲畜占有的情况看达斡尔族人民的经济生活，在上述 634 户中，伪满洲国没有牲畜的有 367 户，占 58%；1947 年土改前没有牲畜的有 242 户，占 38.2%；现在没有牲畜的只有 50 户，占 7.8%。在有牲畜的户中，有 1—4 头（匹）的 395 户，5—10 头的 176 户，15 头以上的 13 户。

只有解放后，达斡尔族人民才过上了富裕幸福的新生活。

（摘自齐齐哈尔《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文史资料》第一辑）

日寇对鄂伦春族 实行“利用和消灭”政策

葛长海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1933 年居住在我省大、小兴安岭的毕拉尔路、库玛尔路、阿力·多布库尔路、托河路的鄂伦春族行政，仍归属于伪黑龙江省民政厅蒙旗科和兴安北省管辖，名义上部分地保留了原来的协领机构，可实际上是由日寇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的特务机关直接控制。

1933 年 1 月，日寇占领黑河后，当地鄂伦春族行政就是由黑河特务机关来指导。直接指导责任是由特务机关委托的副县长来担当。以达到在政治上控制，经济上掠夺，军事上利用，文化上奴化鄂伦春民族之目的。

特务机关的指导要领是：

1. 指导系统：特务机关长——副县长（为直接责任者）

2. 指导方针：

①不开展其文化，要维持其原始生活。②不使其归农。③当作特殊民族实行隔离。④严禁鸦片。⑤严禁白面。⑥构成其独立生活的道路，排除其依存生活习惯等。特务机关制定了一整套的“利用和消灭”鄂伦春族的统治办法和政策，使鄂伦春民族陷于苦难的深渊之中，濒于灭绝的境地。

山林队

日本帝国主义一面利用清朝、中华民国的统治政策，一面拉拢和利诱协领和佐领等掌握鄂伦春族行政权力的上层人物，为殖民统治工具。

1934年春，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河崎到任后，在黑河和齐齐哈尔特务机关的主持下，召集了库玛尔路协领于多三和毕拉尔路协领关文群以及这两路的佐领，骁骑校等18名主要头面人物，在齐齐哈尔召开了鄂伦春族首领佐领会议，宣扬“日军武力”、“日满一体”其核心是“以夷制夷”，蓄意制造鄂伦春族、回族、汉族和其他民族间的矛盾。

同年11月，黑河特务机关为了进一步推行其殖民主义统治政策，召开了第二次佐领会议，“以夷制夷”更加露骨，会上煽动鄂伦春人说：“你们不要怕汉人，我们给你们作主，打死一个汉人就像打死一只狍子。”

1935年6月中旬，在日本关东军的主持下，分别在逊河、呼玛县署召开了第三次佐领会议。除进一步做怀柔工作外，还派所谓的“考查团”到鄂伦春族游猎的深山老林，以调查了解猎民狩猎生活为名，暗地为组建山林队做准备。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牢牢控制鄂伦春民族，就在这次会议上，彻底废除了清末民初以来的佐领制度，沿袭了民国时期的“山

林游击队”（民国后期改为保卫团）的形式。

伪满康德3年（1936年）开始，黑河特务机关利用鄂伦春族精于骑射和熟悉山林的民族特点，在原有佐领制的基础上，在伪黑河省，强迫所有青壮年猎民，按照地区编成鄂伦春族“山林队”。在毕拉尔路组建了两个山林队。游猎于沾河中上游、都鲁河、毛兰河、桦皮墙子、浦拉口子、卡拉其口子等地的猎民为一队；乌底河、库尔滨河、阿廷河上游、都鲁滨河、克棱河、乌云河等地的猎民为二队。

在原库玛尔路瑷珲县署内组建了四个山林队：宏胡图为一队，法别拉河为二队，哈尔通为三队，麦海为四队。伪黑河省包括呼玛县署内共组建了十几个山林队。

黑河特务机关对每个山林队，派一至二名日本指导官直接控制。虽设一名鄂伦春族队长，但绝对服从日本指导官的指挥。

日寇针对东北抗日联军的追剿和对苏的侦察破坏，每年春3月，秋9月组织山林队，接受日本指导官和副官的两次军事训练，每次一个月左右。在训练期间严禁猎民上山打猎，每个队员强迫脱下猎装，穿上日本军服、头戴钢盔，进行山地伏击、骑兵追击以及渡河实战的演习。

1943年春，在瑷珲县九道沟搞军事演习时，有一名队员莫财福的父亲，被日寇无故打死。这时我刚有点记事，看到莫财福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使得广大猎民有话不敢说，有苦无处诉。日寇把各地游猎的猎民，强行赶到深山里集中起来加以管制，过着暗无天日的集中营似的生活，相互之间很少联系，生怕遭到不测。

谋略班

黑河特务机关内专设鄂伦春民族的谋略班，由谋略班派遣

日本指导官，严格掌握鄂伦春民族的思想动态，指导鄂伦春谋略部队（即山林队）。鄂伦春族人民的思想、言论、动态置于特务机关的严密控制之下。

鄂伦春族狩猎及山林队所用的枪支、弹药，均由谋略班按人数组编制按时发放。

谋略班的主要任务就是控制和策动鄂伦春族和山林队，进行反苏反共的阴谋活动。强迫鄂伦春族猎民对抗联进行追剿和对苏侦察破坏。

弃农归山

清末民初统治者为了巩固边防，加强对鄂伦春族统治，曾采取过“弃猎归农”的政策，叫鄂伦春人下山定居耕田。这个政策推行的结果，到“九·一八”事变前夕，相继建有瑷珲宏胡同、依溪罕、西佐屯、边海屯、哈尔通屯和麟麟屯，耕地有几百垧并有农机具和车马，三分之一的鄂伦春人一边打猎，一边从事农业生产。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鄂伦春民族实行了法西斯主义的种族隔离政策，“不使其归农，当作特殊民族实行隔离”，“不开展其文化，要维持其生活”，禁止鄂伦春人种地务农，禁止同汉族和其他民族交往，更不许通婚，迫使鄂伦春人保持原始狩猎生活方式。

伪满康德六七年间，黑河特务机关对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的鄂伦春人，派兵烧掉其房屋和农机具。哈尔通屯，最多时有30户鄂伦春人是种地务农，同汉族相处得的很好，互相帮助。可日寇来了，闹得人们鸡犬不宁，房子被毁，土地荒芜，被强迫离开家园，赶回深山野林过“吃兽肉，穿兽皮，桦烛消长夜”游猎不定的悲惨生活。使鄂伦春人刚刚发展起来的一点农业，竟

被日本强盗扼杀殆尽，从而给鄂伦春族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经济掠夺

日寇占领黑河不久，特务机关设立了经济掠夺机构“满洲畜产株式会社”，对猎民强制规定“猎民每次出猎回来后，把猎取的兽肉、皮张各种猎产品，只准全部交给“满洲畜产株式会社”，不许随便出卖，如果私自出卖就违法。违法者不但猎品和枪支要被没收，往往还要遭到毒打。猎民一年到头来“风里来，雨里去”辛辛苦苦猎获的贵重毛皮、名贵药材、鹿茸、人参等被掠夺一空。开始不管交多交少，还配给一点粮食和布匹，后来只配给一点橡子面和更生布（麻袋片），鄂伦春族广大人民终年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

日本指导官铃木等人为了讨好上司，经常勒索猎民的贵重毛皮送礼。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每次来黑河视察时，他们总要送土产以示敬意。猎民所藏的最上等的水獭皮，自己舍不得用，也被铃木掠去当作礼品。

黑河特务机关长武部讨雄大佐，离职调转关东军参谋部时，鄂伦春族上层人物在铃木等人的授意下，赠送了头尾长约2米、绒毛长约2寸的稀有水獭皮。

奴化与摧残

日本帝国主义对鄂伦春族实行了奴化和愚民教育，“不开展其文化，要维持其原始生活”，适龄儿童得不到学校教育，成人绝大多数人是文盲。

伪满康德7年（1940年）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培养一批忠于日寇的奴才，曾个别试办过小学教育，向学生教授满文和日文，

从小灌输法西斯思想，宣扬“日满一德一心”，企图使鄂伦春人永远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之一，进而使他们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驯服工具。

特务机关用配给大量鸦片的毒辣手段，从精神和肉体上，来毒害和摧残鄂伦春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反抗精神。有病不给治，任凭疾病蔓延。规定凡20岁以上不论男女都普遍配给鸦片，一般每人每天一分，多者三至四分。毒化政策推行的结果，使鄂伦春族人民的体质受到摧残，精神萎靡，严重危害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1942年，日本鬼子强迫呼玛县一带所有鄂伦春族小孩，都到日寇办的“学堂”去念书，向家长勒索高额的学费。在学校一面施以奴化教育，一面灭绝人性地在孩子们身上作细菌试验，八十多个鄂伦春学生，一个冬天就被杀死四十多个！

鄂伦春民族由于日本鬼子的残杀和奴役，加之缺医少药，各种疾病的蔓延和瘟疫的流行，使之毕拉尔路和库玛尔路的鄂伦春族，由1917年的2731人，到解放前夕（1945年），只剩下1007口人。

利用与残害

伪黑河、北安省及呼蒙地区，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三支队的游击区。

黑河特务机关曾嘱托铃木喜一中校，在他指挥下鄂伦春山林队70余人，被迫编成讨伐队，尾随抗联三支队。由于山林队熟悉山林，又善于骑射，使抗联三支队几次遭到袭击，部队损失很大。

康德4年（1937年）3月，伪逊河县首席指导官藤泽智彻指挥山林队特搜班，向伪北安省境内派遣鄂伦春人侦察抗联的动

向，不久侦得抗联赵尚志部150余人，向松树沟方向进发。伪黑河省警察厅长大园长喜接到报告后，命令黑河日本守备队原田中佐，指挥一个步兵营（大队）和一个骑兵连（中队）及瑷珲县警察队围剿。于4月下旬在逊河县松树沟西南约30公里处的山头伏击赵尚志部，使抗联战士二十多人牺牲，被俘一人。

日本特务机关严密控制山林队，不准猎民接近汉人，若在山里发现抗联，要马上回来向日本指导官报告，谁要是同抗联取得联系或给抗联当向导，就会遭到日寇的残酷屠杀。伊春林区查拉巴奇游猎的李朱产和莫乌德等猎民，早在1935年就与抗日联军建立了联系，经常为抗日联军作向导。1936年抗日联军赵尚志同志率领部队，夜袭日本设在伊春的警防所，消灭了许多日寇，缴获了大批枪支和其他物资。当时为了防备敌人的突然报复，李朱产和莫乌德等猎民动员附近的鄂伦春族，将这些战利品转移到深山里贮藏起来。后来被日寇查觉，将李、莫等5人捉住，带到伪逊河县残酷杀害了。

1937年4月，日寇抓住给抗联赵尚志部当向导的一名鄂伦春族猎人，带到逊河县城附近被日军曹长砍头，更为残忍的是伪瑷珲县警察局特务股警士申岛宗一，把被害者脑浆取出烧黑，同其他日本强盗一起吃掉，还美其名曰“能治自己的淋病”。

在伪满时，铁力县的一个鄂伦春族猎民，因不堪日寇的残酷统治，他在山里击毙了两个日本强盗。特务机关就把“乌力楞”十几户猎民，男女老幼四十多人都抓起来，关进一个破房子里。日寇每天严刑拷问，关了十多天，没有一个人说出是谁杀死日本强盗的，个个怒目而视，宁死不屈。最后逼得特务机关无计可施，恼羞成怒，点着了浇上汽油的破房子，把这四十多人都活活烧死，就连吃奶的婴儿都没能幸免。

绰尔河有两名鄂伦春人无故被日本特务机关打死了，当时

有一位名叫申肯的猎人对此非常愤慨，经常想着清算这笔血债。在一年后的一天，他终于杀死了抢劫他们的日本鬼子，然后逃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无法捉到他，就唆使别人把他打死了，并说这是民族内部的互相残杀。申肯的妻子，被日本指导官抢去了，毫无人性的日本法西斯刽子手将他全家5口人都杀死了。

奋起抗日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压迫下的鄂伦春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很多猎民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抗联队伍，积极投身抗日救国的斗争。游猎于铁力及依兰山区的孟庆海等数名猎人，通过他们的汉族老朋友，与抗日联军北取得联系，并于1938年在北安袭击日寇的战斗中光荣牺牲了。当时，抗日联军北满三、六、九、十一军，都有鄂伦春人参加，其中第六军就有四十多名鄂伦春族抗联战士。有的鄂伦春族参加革命队伍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第二军指挥部的两个鄂伦春族——安得有和元宝，从小参加部队，在革命队伍中进步很快，1941年在参加嫩江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鄂伦春族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给与抗日联军极大支援，给抗日联军引路当向导，送信传递情报，运送粮食和看管野战物资，积极地支援抗日战争。

1945年苏联出兵我国东北，日本帝国主义垮台前夕，黑河地区的鄂伦春族人民英勇地进行了赶走日本统治者的斗争。呼玛县署绰老河的猎民，联合起来，趁日本指导官和十几个日本兵中午吃饭的机会，把这伙强盗全部杀掉了。

逊河县署的鄂伦春族猎民，携家逃到毛兰河顶子，日本指导官藤泽智彻和他的副官，还强迫“山林队”过沾河去打苏联红军。因逢涨大水无法过河只得返回，猎民们在回来的路上商

量好，在前面过小河时就动手。大队人马走到小河边排队准备过河，日本指导官骑在马上，莫金生从后面赶上，一枪就把日本指导官的脑勺击碎，一头栽倒在马下。正在过小河的日本副官听到枪声刚回头看发生了什么事，好几颗仇恨的子弹射进了他的胸膛。猎民们就这样把作恶多端的日本指导官和副官打死在山里。

在鄂伦春自治旗，人们至今还传颂着王明贵同志与鄂伦春族猎民盖山的友谊。盖山在抗联的宣传教育下，懂得了抗日救国的道理。他联合达斡尔族、蒙古族、朝鲜族的十几个猎民同抗日联军第三支队队长王明贵同志结拜为抗日救国的生死弟兄，共同立下了谁也不投降，谁也不叛变，一致抗日救国的誓言。广大猎民在盖山的带领下，给抗联侦察敌情，送情报，保护抗联，结下了深厚的血肉情谊。他们还配合抗联三支队，一举攻下了日军据点“义合公司”。把关在“义合公司”的几百名达斡尔、汉等民族的林业劳工都解放出来。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

日伪统治时期鄂温克族的苦难

薛双喜 整理

日伪时期，散居在索伦旗北部的特泥河、莫尔格勒河两个苏木和额右旗三河，拉布达林等地区的鄂温克民族是一个以狩猎、游牧为主，文化落后，人口极少的弱小民族。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政治上受歧视，经济上受掠夺和剥削，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1932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呼伦贝尔地区。1933夏天，鄂温克牧民在莫尔格勒河夏营地，头一次看到了个子不高、身着黄色军装的日本人。日本人来到莫尔格勒河草原后，视鄂温克族为苏联过来的民族，在政治上对其不予信任，采取拉拢利用的政策。他们先从青年鄂温克牧民中大量征兵，又从各苏木抽调一名公务员，到王爷庙伪国兵军官训练所培训，培养了伪国兵第一批鄂温克族军官（这个军官训练所，后来成为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

从小生活在山区草地的鄂温克青年，进城当了国兵和警察后，随着生活条件和周围环境的变化，有些人养成了吃、喝、嫖、赌的恶习。更为严重的是，有的人嫖宿妓院而染上了梅毒病。这些患有梅毒病的士兵，从部队复员回乡后，又将梅毒病带到鄂温克人聚居的地区，使一些鄂温克牧民也染上梅毒病。由于当时梅毒病的蔓延，严重地影响了鄂温克族人民身体素质和人口的增长。

伪满洲国成立后，鄂温克人居住的特泥河、青格尔、那吉以及苏联边境的黑山头（呼和道布）、额尔敦陶勒盖、哈日诺尔等地都驻扎了日本兵和边境警察。牙克石警察本队给鄂温克牧民发了居住证明书，从而控制了鄂温克人在边境地区的活动。警察特务在鄂温克人聚居的地方横行，探听和注视鄂温克牧民的言行，倘若谁不小心乱说乱动的话，就将遭到警察特务的逮捕和关押。

1937年，三河的日本特务机关以搜捕苏联特务为由，突然逮捕了居住在三河一带的鄂温克牧民高·达喜、普·占布拉、皮·米特克等、阿力克谢、车车、布利亚特旦等6人，关押在三河日本宪兵队的监狱里，多次进行严刑拷打，逼问其“苏联特务”的罪行。后来，日本人将车车派往苏联境内搞特务活动，从

此再无音讯；高·达喜被日本人在身上注射了细菌药液，放回去后惨死在家里；皮·米特克等4人被关到三河日军飞机场当劳工，1945年日本投降前，被日本兵用汽油烧死于三河飞机场。总之，日伪时期鄂温克牧民残遭日本警察特务的迫害已成为屡见不怪的事情。

此外，在经济上，鄂温克牧民还承受着伪满洲国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的压力。每年7月份牧民向伪满洲国交纳各种税金（用牛、羊折税金）的同时，还要为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畜产公司的收购任务而交售大量的牲畜。畜产公司收购牲畜的评价员，对牧民非常刻薄，他们把牧民交售的能出八普特（每普特16.1公斤）以上肉的大牛，只给评3—4普特肉；成年膘满的大羊给3元钱。对此鄂温克牧民敢怒不敢言。倘若谁敢和评价员讨价还价，就会遭到日本兵和警的一顿毒打。而且挨了打，吃了亏也无处去说理。当时，日本人每年向鄂温克牧民征购良种军马。因此，鄂温克牧民手中能骑用的马匹所剩无几。有些牧民放牧骑用的马也被日本人牵走，只好步行放牧。

日伪统治时期，鄂温克牧民的生活水平逐年下降，生活用品的供应也非常紧张。当时只按月限量供应发霉变质的粗杂粮，烟、酒、糖、茶之类的副食品根本见不到，牧民老乡只好用一些草生植物来代替茶食。穿带的棉布之类更为紧张，由于牧民手头无钱购买当时供应的数量极少的黑白洋布，只得穿廉价的更生布或用羊皮、兽皮制做的衣裤。生活到了极为贫困的境地。

康德5年（1938年），伪兴安北省公署决定，特泥河以南的莫哈尔吐苏木仍归属索伦旗；特泥河以北的特泥河、莫尔格勒河两个苏木归属于陈巴尔虎旗。陈巴尔虎旗将特泥河、莫尔格勒河两个苏木合并成一个苏木，命名为特泥河苏木，在特泥河阿迪盖设了苏木政府，委任鄂温克人巴日迪为苏木章京。

由于鄂温克民族一部分是从苏联过来的民族，又和苏联人杂居在边境地区，日本人对鄂温克人是又恼恨，又不放心。所以，借划分的机会，密谋策划了强迫鄂温克族南迁的计划。从此，生活在特泥河、莫尔格勒河草原上的近百户鄂温克牧民，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倾家荡产、背井离乡，南迁到大兴安岭北坡的沙巴尔吐、莫盖吐、乌鲁西、乌兰岗等地（属索伦旗所辖）。在特泥河、莫尔格勒河两岸肥美的草场上生长的牛马羊，随主迁到大兴安岭北坡地区后，由于不服其寒冷的气候和贫瘠的水草，又吃不到盐碱，开始大量死亡，牧畜业生产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如原莫尔格勒河苏木的鄂温克牧民阿里巴·拍玛，南迁时地拥有30多匹马，40多头牛，300多只羊的富裕户，被迫迁住到大兴安岭北坡的乌鲁西后，几年里牧畜全部死光，全家人迫于生活，只好上山狩猎为生。

被迫南迁的鄂温克牧民，虽然日夜思念自己的故乡，不习惯在大兴安岭北坡地区生活，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殖民统治下，谁也不敢擅自搬回原来的故乡。

鄂温克人高·巴德玛出生在苏联，会说俄语，是聪明精干而很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人。他1938年在三河当国兵，1940年复员到海拉尔协和会工作。1941年协和会以扶持边远山区贫困牧民为由，派高·巴德玛到鄂温克人聚居的特泥河苏木负责组织狩猎队。高·巴德玛到特泥河苏木后深入鄂温克牧民中间，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作，先后有普·伊利亚、车·特木勒、普·吉格吉德、达·旦金、库·达喜、桑·伊万等12名精明强干，擅长打猎的鄂温克牧民报名参加了狩猎队。从而以高·巴德玛为首的狩猎队宣告成立。狩猎队刚成立时装备简陋，猎手们骑着各自的马，扛着原始落后的别列旦枪，走进深山老林。由于狩猎队上山初战告捷，获取了不少猎物，有了可观的收入，名

声大振，在鄂温克牧民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牙克石警察本队和日本人的注意。日本人为了拉拢利用这个由鄂温克牧民组成的狩猎队，首先由牙克石警察发给枪支弹药，更新设备。让狩猎队担负安定特泥河地区地方秩序、追剿匪盗的任务。从此以高·巴德玛为首的狩猎队，在狩猎的同时，积极完成警察本队的各项任务，深得警察本队和日本人的信任。日本人也充分认识到利用这一不穿军装、不拿工资的少数民族武装力量的真正价值，让其完成侦捕苏联特务、控听鄂温克牧民中反日反满言论的政治任务。从此，鄂温克牧民在称狩猎队为“快枪队”的同时，给出卖民族利益，效忠于日本法西斯的高·巴德玛也起了一个“狗腿子巴德玛”的绰号。

1943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修筑从牙克石通往黑山头的日军专用路线（未修成日本就投降了），从内地抓来大批劳工，在特泥河东北侧的额莫勒哈达山挖山修隧道。日本人为保护这一隧道，特调来熟悉当地地形，懂得少数民族语言的“快枪队”担负保卫额莫勒哈达山隧道的任务。“快枪队”进驻额莫勒哈达山后，日军方面按月发给补助工资。这时的高·巴德玛已成为身着伪警服、腰挎大洋刀的警察官。实际上，高·巴德玛于1940年复员到海拉尔协和会工作时就成了日本特务。他是接受日本特务的旨意，打着扶持鄂温克贫苦牧民的旗号，来特泥河苏木欺骗和拉拢鄂温克牧民组织狩猎队的。在高·巴德玛的唆使和日本人的拉拢引诱下，狩猎队最终变成了穿牧民服装，维护日本法西斯利益，受日本人控制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力量。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高·巴德玛，最终未能逃出历史的惩罚。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被苏联红军抓获，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鄂温克人里·钢克出生在苏联，会说俄语，体格强壮，爱

好打猎，勤劳勇敢。他从小失去了父亲，伪满洲国成立时和老母亲居住在特泥河苏木沙巴尔吐村，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1938年，里·钢克被抓当国兵，到伪满第十军管区第八团驻防蒙古边界的一个连里当战士。

1939年诺门罕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将大批伪国兵调到诺门罕战场，将成千上万的蒙、汉、达、鄂等各民族健儿推到战火纷飞的前线，为日本帝国主义当炮灰。里·钢克所在连队也被调到第一线，日夜守防在战壕里，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在这生死关头，里·钢克于7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单人独马逃离诺门罕战场，跑回自己的故乡巴尔吐村。为防备警察宪兵的追捕，他白天隐蔽在屯子北山的桦树林里，晚上偷着回家吃一点茶饭，开始过着不见人烟的隐匿生活。由于诺门罕战争期间，曾多次发生伪国兵逃离战场的事，日军方面给各省、旗、苏木、嘎查，逐级下达了追捕“逃兵”的紧急命令。当时沙巴尔吐村叫普郎克的鄂温克人，在上级命令和警察的威逼下，向当时的扎罗木德警察所透露了里·钢克的情况。海拉尔日本宪兵队方面当即派警察宪兵到沙巴尔吐村和北山附近追踪。此时，藏在山林里的里·钢克又冻又饿，于9月初的一天夜里偷着回家时被警察宪兵捕获。

日本宪兵队抓到里·钢克后关押在监狱里，审问后，作出“没有发现其他重大问题，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交给了伪国兵第八团，送回原驻守蒙古边界的连队里继续当战士。里·钢克被送回连队后，在“逃兵”这顶政治帽子的压力下，思想情绪始终安定不下来，日夜盼望有朝一日能获得自由。尤其是日本法西斯没完没了的军事训练，日本军官的骄横野蛮，挨打骂的非人生活，不平等的生活待遇，再次导致了里·钢克二次逃离。

1940年9月上旬的一天夜里，里·钢克偕同连里一名布利亚特士兵，各骑一匹马，携带一杆“三八”枪和子弹，逃离所在连队，跑回沙巴尔吐村看望老母亲后，转移到额莫勒哈达山的深山密林里，再次开始了不见人烟的隐匿生活。

藏身于额莫勒哈达山里的里·钢克和那个布利亚特士兵，为安全渡过寒冷的冬天，在德日莫勒吉峪里挖地窖子准备住处，又偷杀了牧民一匹骒马，捕猎了一些野兽。但是，海拉尔日本宪兵队派了20名警察和宪兵到额莫勒哈达山搜捕。11月中旬的一天，搜山的警察宪兵从德日莫勒吉峪的林间草地上发现了两个带拌子的马，确认里·钢克和布利亚特士兵隐身于这个山谷。天黑后，警察宪兵从密林深处发现了里·钢克所住地窖子的灯光，20来名警察宪兵顺着灯光包围了窖子，里·钢克和布利亚特士兵交械投降了。

里·钢克第二次被抓获，送到海拉尔宪兵监狱关押了一年。1941年又被移送到齐齐哈尔宪兵队监狱里。有关里·钢克的下落，据1947年住在陈巴尔虎旗浩特陶海村名叫伊万诺夫的苏侨说，他于1942年被关押在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监狱时，曾和里·钢克在一个监号里。当他们相互认识为老乡后，经常用俄语通话。日本人发现了这一情况，就把里·钢克转押到别的号里，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惨遭日本兵的枪杀。

日寇对鄂温克族猎民的统治

阿力克山德·伊那见基·库得林口述
玛妮整理

1932年12月，五个日本兵佩带着短枪和大枪，从海拉尔出

发，乘坐别列考夫（苏联人）商人的马爬犁来到了当时乌启罗夫附近的伊力坎。以做买卖为名和鄂温克猎民接触。通过乌启罗夫的安达克^①收去了我们的灰鼠子皮、鹿鞭、鹿尾、犴角等猎品。又通过安达克换给我们面粉、食盐、茶叶、子弹炮、铅弹和别列弹弹壳。记得当时是3张灰鼠子皮换一个弹壳，一张灰鼠子皮换一包火柴，40分特（32市斤）一袋面粉需13张灰鼠子皮，一瓶白酒需7张灰鼠子皮，一分特茶叶（等于现在8两）需8张灰鼠子皮，一尺更生布需4张灰鼠子皮。这几个日本人在乌启罗夫呆了十几天，然后同别列考夫一起返回海拉尔。

1935年3月，有三百多名日本军人由海拉尔坐汽车开到乌启罗夫。他们来了不久，就收缴了猎民的枪支，把男女老幼都赶下山，开了半个月的会，重新选举了鄂温克猎民的阿塔曼^②。他们是：阿里山德·库达林；嘎瓦日伊拉·尼古拉·索拉托斯克；亚克夫·瓦西里·索洛果若夫（当时瓦西里是漠河部落的。以上3个人是以前的阿塔曼，这次又重新选任）。会议就进行了这么一个内容，然后让猎民上山。

1938年夏天，一个自称叫白连成（苏联名叫八月）的蒙古族人和日本上尉小野由大维格德给当向导，骑马上山走遍了鄂温克猎民的各个部落，这个人既会说日本话，又会说苏联话，也会说鄂温克话。他们每到一个部落，就宣传不要和苏联人打交道，要和日本人交朋友，建立友好往来。还告诉猎民，乌启罗夫已建立满洲畜产株式会社，收购猎民的猎产品，供应猎民粮食等日用品。

同年冬天，白连成和一个名叫巴拉杰伊的鄂温克姑娘结了婚，两年后巴拉杰伊得病死了。

① 安达克：旧社会同鄂温克猎民做买卖的商人。

② 阿塔曼：鄂温克猎民部落中的最高头领。

1940年，在离乌启罗夫30公里的阿巴河建立了一个日本据点东大营，有4所木楞房子，驻有三十多个日本兵。这个地方不让猎民靠近。同年5月，白连城和一个日本人牵着四不像（驯鹿）走遍了当时鄂温克族猎民7个部落。这次主要是通知7月10日男猎民下山，参加训练。参加这次训练的有八十多名鄂温克族男猎民，其中最大年龄70岁，最小年龄只有14岁。在这次训练中，白连成给日本人当翻译。早晨5点起床训练，训练项目主要是列队、立正、稍息、齐步走。吃完早饭就给日本人干活，打拌子。由于语言不通，训练时动作稍有不对，就受到日本人的拳打脚踢和鞭子抽。扣子系不好、帽子戴歪了，日本兵不由分说就打嘴巴子。打拌子时，日本兵拿着上好刺刀的枪看着，怕猎民逃跑。在这期间，我们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奴役，他们根本不把我们鄂温克猎民当人看待。当时有个叫大拉非的猎民小伙子（那年他27岁）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出操，不给日本人干活，结果被日本兵用鞭子和棒子打得死去活来，皮开肉绽，最后大拉非因受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刑而从悬崖上跳河自尽了。此事引起了广大鄂温克猎民的极大愤慨，这些猎民聚集在一起纷纷要找日本人算账。日本人一看势头不好，怕猎民造反闹事，让猎民阿塔曼出面，把大拉非的尸体从河里打捞出来，按照猎民的风俗习惯，把大拉非安葬了。

日本人集训鄂温克族猎民从1940年7月10日开始，一直到日本垮台前结束。在集训期间，他们把猎民的枪支全部收缴，由日本人统一保管，然后分期分批进行轮训，每批约40人左右参加。每两个月一换班。轮训期间，吃的是自己的粮食。当时鄂温克猎民的口粮由日本人设在乌启罗夫的满洲畜产株式会社控制。猎民妇女领粮时，交了钱就把男猎民的口粮扣下统一拿到日本东大营猎民训练所。猎民训练，给日本人干活不但不给

报酬，而吃的用的都是自己的。男猎民在日本东大营训练，扔下妇女，小孩在山上，生活实在困难。因男猎民训练不能生产，也就没有猎产品，换不回粮食和生活日用品。家家缺吃少穿，猎民妇女买不起花布做民族服装，只好买白布用牙格达、杜柿染成带色的布做衣服穿。用阿拉成哈（松树蘑菇）代替肥皂。日本统治时期，猎民缺医少药，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在日本统治鄂温克的十几年中，就有 53 户猎民二百多人死亡。日本帝国主义给鄂温克族猎民带来了灭绝种族的灾难。

1945 年 8 月 15 日夜里 12 点，苏联红军攻打了驻在乌启罗夫的日本兵营。根据苏联红军的指示，广大猎民担当了搜索逃跑的一部分日军的任务。8 月 24 日，15 名鄂温克猎民在坤德伊万和伊万杰列果罗夫的带领下，在艾牙苏克河搜索到 21 名日本兵，经过激战，打死了 13 名日军和 1 匹军马，缴获战马 8 匹和不少枪支弹药。其余 8 名日军逃到金河附近，被全部击毙。在满归河对面的西瓦里地带，老马嘎拉、小八月、阿里克山德、老八月等猎民，以及在亚库斯克、嘎年、谢里杰伊、嘎卡克、伊万索，猎民们都曾根据苏联红军指示，搜索日军。

日本侵略者对赫哲族的迫害

〔赫哲族〕 尤志贤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 14 年，赫哲族人民遭受到了残酷的奴役和摧残。

日本侵略者为了进一步挑拨民族关系，把赫哲族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分割开来，最终达到消灭赫哲族的罪恶目的。于

1942年初强迫富裕锦县齐齐喀、莫日红阔、哈鱼、街津口和抚远县勤得利等地的赫哲人离开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松花江、混同江沿岸，迁徙到百里以外的密林沼泽地建立了所谓一部落、二部落、三部落，与外界隔绝起来，以达到“分而治之”和逐步消灭的目的。

日本特务机关于1941年入冬季节，把赫哲族的强壮劳动力强行抽去，分别到三个部落的场地，在伪满和特务的看押下，根据各部落的人口多少，挖了几个集体居住的地窖子，每个地窖子能住3户到4户，二十来口人。地窖子挖好后，运去了一些小米、高粱米、玉米面，还有点豆油、食盐等，以便搬去时配给食用。1942年初，日寇强迫齐齐喀以下，勤得利以上沿江居住的赫哲人，不论男女老幼，在5天之内全部搬走。赫哲族人世世代代居住在沿江一带，以渔猎为生。加之和汉族及其他民族多年相处，关系密切，都不愿意搬走，有的人家找人说情也不准。虽然有的人家到别的屯子里躲起来，或到山里去打猎，下江捕鱼，但都无济于事，回来后仍被强制搬走。有的老人急出了病，实在行动不了，只准许病人暂不去部落，病好后再去。搬家也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事，绝大多数人家没有马，只有个别人家有匹猎马，可以套上爬犁，除每户少装点急用的简单被褥和衣服外，什么也带不去。至于捕鱼用的钩、叉、网、船等工具只好全部扔掉，很多人悲痛万分，妇女儿童失声大哭着顶风冒雪徒步出发。有的人家背着孩子或用“拖日气”拉着孩子和少量的东西走，因为路远，在中途还要夜宿，没有房屋，只得找避风的密林，捡些干柴，烧上一大堆火，围着火度过这严冬的一夜，第二天再继续赶路。到达指定地方后，什么菜也没有，几家住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地窖子里，孩子哭、老婆叫，老人叹息，人们终日愁眉不展。运去的一点粮食不到两个月就吃光了。虽然

给了一部分旧“康八”步枪，但每支只给40发子弹，子弹用完就不再补发，有钱也无处购买，即或有野兽也无力猎取。当时冰雪尚未融化，各种野菜都没长出来，人们只好爬到杨树上采“冬青”（杨寄生）煮着吃，但这种东西没法吞咽，难以充饥。尽管如此，但很快也就采吃光了。日子没办法熬下去了，如果再呆下去，就得饿死，大家商量决定，还是回老屯子筹集点粮食，以渡难关。这样各部落都挑选几名年轻、身体较好的男人，趟着雪水到勤得利、街津口、同江等原住村里求粮，有的是借，有的是要。老邻居、老朋友都很可怜他们，每次都给些小米、苞米等粮食。他们自己也不多，给一点就是非常大的帮助了，加上路远道不好走，一个人也只能背四五十斤，好不容易背到村落，大家一分，吃不了两天稀粥就没有了。就这样挨到野菜出来。可是密林沼泽地里只有灰菜、桔梗、莽莽菜、山白菜等，人们吃了后就浮肿。为了长远之计，男女下手用镐头刨点地，种点玉米和窝瓜等，可是树荫大、地凉，种什么也不长。没有办法，还得回到老屯求亲靠友借，要粮食。夏天回屯更是困难了，除了蚊虫小咬外，中途还有小河、漂垡甸子，小河可以用木筏摆渡过去，漂垡就不好办了，看起来是草地，人上去就沉下去，如果没有救人，很快就会淹死。有一次一部落的尤志玉掉进了漂垡的裂缝里，抢救上来，已经没有气了，经过抢救多时，才好不容易缓过气来。还有一种讨厌的“蚂蟥”（本地人叫蚂体）吸在大腿上无法弄掉，只能用鞋底拍打，才能下来。夏天男人盖房子，女人就趟着齐腰深的水，回老屯背粮。因此，有好多女人得了妇女病，流产的更多了。穿的就更谈不上，有的男人冬夏穿狍皮衣裤，披着麻袋，妇女穿点“更生布”，算是好的了。十多岁的孩子们仍光着身子，有的十六七岁的大姑娘因没有衣裤出不去门。没有被、褥，没有炕席的人家就更多了。他们冬

天全靠烧柴取暖，很多人夜间睡觉都是混身滚，枕“塔头”（河泡边草根土）。因为生活条件太差，又没有任何医疗设备，有病只好等死。有时，日寇也派医生来，但不是给赫哲人治病，这些刽子手，借治病为名，把赫哲人挨个骗出来，抽血作试验。由于天寒地冻，无衣缺食，水土不服，疾病流行，再加上日寇对赫哲人实行毒化政策，发给“吸烟证”和所谓“福寿膏”（即鸦片烟膏），“照顾”赫哲人吸食鸦片，以达到其恶毒的目的。

在经济上，日寇对赫哲人实行猎获品和鱼产品“出荷”，以低价强制收购渔猎品，实际上是公开掠夺。在政治上日寇对赫哲人的迫害就更说不完了。他们说赫哲人不是通苏就是通抗联，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送同江宪兵队。一部落的赫哲居民尤来财于1945年春以“通苏”的罪名抓去送到同江宪兵队，没有逼出什么口供，最后扔到狗圈被咬死了，家里只剩下一个寡妇和两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就这样，赫哲人大批死亡，仅三部落在短短的3年中就死亡五十多人，占本部落总人口的40%多，其中：尤太保家5口人，死去4人；梁才家7口人，死去5人，芦生家3口人，死去2人。一部落的尤立忠家5口人仅剩下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这样造成的孤儿、寡妇、单身汉就举不胜举了。特别是从1944年下半年到1945年的上半年，这三个部落几乎两三天就死一个人，齐国卜家一天就死了两口人。有病的人就更多了，一得就是全家，老百姓叫“窝子病”，实际就是饥寒交迫造成的“伤寒病”。刚开始时，人病了还有人伺候，到后来全家都病了就没有人照看了。开始死了人，有人抬，还可以用杨木匣成棺材埋上，到后来只能勉强拖去坟地简单地埋上就不错了，冬天就放在坟地外面用树叶盖上就算完事了。有的人虽然在这次灾难中没死在部落，盼到了解放，但由于在部落期间受尽摧残，身体已经衰弱不堪，离开了地狱般的部落，回到了盼

望已久的故乡，不久就死去了。尤连枝的伯母和梁才的叔父回到江边的老屯没住上5天就死了，他们虽然不是直接被日寇亲手杀死的，但也是日本侵略者夺去了他们的生命。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摧残下，赫哲族人口急剧下降，据调查，民国初年，赫哲族约有2500到3000人，到1945年解放前夕，只剩下300多人了，在这四十多年中，赫哲族人口差不多减少了90%。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垮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拯救了这个濒临灭绝边缘的民族。幸存的赫哲人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恨之入骨，仅一部落的群众在解放当时就抓住5名逃跑的日本鬼子，押送苏联红军司令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赫哲人沿江定居发展生产，繁荣了经济，提高了生活，人口也增长到一千五百多人。

（摘自《同江文史资料》第一辑）

八岔赫哲族人民 反抗日寇迫害实录

尤志贤

1938年，日本侵略者为围剿东北抗联，把抚远以西，王家店以东沿江的赫哲族和极少数汉族渔民，强行集中到秦皇岛下游东岸，实行归村并屯，建立了八岔屯（即今八岔乡所在地）。

并屯以后，按户分段修筑土城墙，把祖祖辈辈沿江捕鱼的赫哲人圈在土城里管制起来。设立了屯长和牌长，屯长叫高玉和，牌长叫褚思焕。他们二人都是汉族，以开旅店为生，兼种

少量土地。但是，通苏通抗联的事件仍然屡有发生。驻抚远的日寇唯恐长此下去愈演愈烈，又采取了“以赫哲人治赫哲人”的政策。1939年，日寇把额图以东，海青以西的赫哲族育壮年，强行拉去建立了一个24人的警察队。队长叫傅青山，封了个警尉官衔，是个快50岁的赫哲老粗，还有一个警尉补叫管永利，是汉族人。另外，还设了两个警长，一个叫傅景琦，一个叫董贵福，都是赫哲人。日寇除了企图通过警察队控制赫哲人外，还想利用他们山路熟、枪法好的特长，进山打抗联。可是，警察队中的绝大多数人早已看透了日寇的用心，便采取消极怠工的办法，不给侵略者出力。他们进到山里不是喝醉酒迷了路，就是在附近绕上几圈就回来。因此，进山几次也没找到抗联队伍。

后来，日寇看出警察队不肯出力，就把他们全部集中到八岔屯，建立了固定的警察队部，并盖了办公室和洗澡堂，还派了一个叫竹下的日本兵管理这个警察队和搜集老百姓的思想动向。从此，赫哲族渔民每天外出渔猎，都必须到警察队挂条子，说明去处和时间，都有谁同行，经允许才能出去生产，而且必须在太阳落山前回到屯子，把桨和舵全部送到警察队锁假，船由警察锁上。若是回来晚了，就会出现想不到的麻烦事。因此，有时宁可丢掉快到手的猎物，也要提前返回屯子。

一个不到20户的小小八岔屯，竟有这么多警察，平均每户一个还要多。可是，有的老百姓和个别警察，仍然经常和苏联边防军接触，送情报。后来，一个叫毕风山的警察同苏军接触被发现，让日寇抓去送往三江省（佳木斯），再也没有回来。还有一个叫尤永贵的警察看事不妙，趁去抚远办事的机会，过江投到苏联边防军那里去了。日本鬼子看到这些赫哲族警察接二连三地出事，太不可靠，就于1941年把傅青山的队长职务撤掉，迁往内地，换上了汉族的队长和警尉补。

1944年，抚远的日本特务机关得知董贵喜等人是苏联情报员，就派了一个名叫佐野的日本鬼子，从抚远镇坐舢舨船来八岔抓人。40公里的逆水路，靠人划桨，走得很慢，船到八岔已经很晚了。佐野怕晚间抓人不好看管，便决定第二天早晨抓了人就走。可是，此事被去抚远县城办事的赫哲族警察毕发祥得知，他连夜赶回八岔告诉了董贵喜等人。董贵喜等原计划缴警察队的枪，打死鬼子，携枪投苏。后因情况变化，怕寡不敌众，决定悄悄走掉。董贵喜的哥哥董贵福是警长。恰巧，这天晚上董贵福值班，傅文昌站岗，还有警察毕发祥，共3个警察3支枪。他们和董贵喜、毕清林、毕玉、毕春生以及他们的家属共24人，于天亮前乘坐两只大舢舨船，过江投到苏联。

第二天，日本鬼子发现要抓的人跑了，值班的和站岗的也不见了，就到处搜捕，也没搜到。在事情发生前一天，我曾有用粉笔在一个大鱼桶写上了“一去至今不回来”的歌词，鬼子以为写字的人一定知道出逃的事情，就到学校核对字体。幸亏我们的许凤仙老师说：“学生中没有人能写这样的字。”我才得幸免。鬼子佐野没有办法，便垂头丧气地返回抚远。

从此，鬼子的管制更紧了。赫哲族的警察除个别为鬼子出力卖命的，其他人都受怀疑，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把他们调往海青、抓吉、一部落等地。当地只留下毕宝德、黄金贵四个五十来岁的病弱老头子，还有警尉补傅景琦。又派进一大批“新学警”，都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

1944年春，警尉补傅景琦的大儿子傅兴元，又带领两个女人投苏了，因而形势更加紧张。这年夏天，农民阎忠孝和宋福钦，每人手拿一把小斧头，藏在八岔屯中心的一个库房里，准备打死日本鬼子，夺下手枪，过江投苏。等了不大工夫，一个名叫浅野的日本警长从北边过来，要回警察队。他俩装作修网

具的样子让他进去玩玩。这个狡猾的鬼子说有事，没进去。又过一会，一个站岗的警察叫齐留柱，扛着长枪走到这里，阎、宋二人又招呼他进去玩玩。齐以为是熟人，便毫不怀疑地走进库房。齐走进后，阎、宋二人便用斧头把齐的头部砍成重伤。夺下上着刺刀的长枪。正当齐挣扎惨叫时，傅景琦由此路过，闻声拉门刚要进去，就被阎忠孝一刺刀捅在小腹上。傅捂着肚子跑回警察队，已经不能说话了。只是用手往北指了指，不到一个小时就死了。这时，日本警长浅野和汉族警长慌作一团，命令所有警察不许乱动，说走出去打死勿论，也不准乱放枪。这时，宋福钦早已空着手跑出西城门，到腰屯偷了一只打渔船划过了江。阎忠孝刺伤傅景琦后，就喊：“坏人跑了，快追呀！”一直跑出西城门，奔向下口，到了老屯（离八岔三里多地），抱着一棵原木凫水过江去了。警察们吵吵嚷嚷，过了半个多小时才集合起来，等到他们在队长督促下打着手电走进库房，看到的只有奄奄一息的齐留柱。最后，在西大门的门板上看到一个带血迹的手掌印，知道人从西门跑了。但天时已晚，草木茂密，不敢出城，便草草收了兵。从此以后，日本鬼子再也不敢出屋了，警察也不敢单独活动了。

事后，鬼子为稳定警察的情绪，采取了升官增饷的办法，把老警察差不多都升为警长，又增加了一批从辽宁调来的“新警察”。同时，加强特务活动。当时，经常在八岔带枪活动的特务是同江县特务机关的孙有喜，还有一些不带枪的特务。他们对赫哲族渔民进行更加残酷的迫害。1945年春，把一个很老实的赫哲渔民尤开礼抓去，送到同江县宪兵团，动用了各种刑具，也没审出什么口供。最后，无奈释放。释放时，给尤开礼打了一支细菌针，尤开礼没等到家，便死在街津口。

1945年夏天，日本鬼子强迫八岔所有赫哲人到内蒙古。村

民闻讯，顿时慌乱起来。有的哭哭啼啼，有的咬牙切齿想拼命。8月15日拂晓，忽听警察队里和街上有冲锋枪声，还有人的吼叫声，大约一个小时，逐渐平静下来，到外边一看，董贵福手提匣子枪，领着一队苏联兵。他对大家说：“日本鬼子被打死了，警察也投降了，你们都解放了！”从此，赫哲人获得了新生。

从1938年并屯，到1945年解放，八岔先后换了竹下、藤田、菊地、浅野、上村五个鬼子军官。

董贵福等24人中的青壮年，过江后就参加了苏联边防军，经常过来侦察。解放时，带领苏军解放了八岔、一部落。有的人还当向导，去解放海青、萝北等地，并荣获了斯大林纪念章。1947年，董贵福、董贵喜、毕清林一家回到祖国，在八岔参加生产，成为农村建设中的骨干。

(政协同江县委员会供稿)